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7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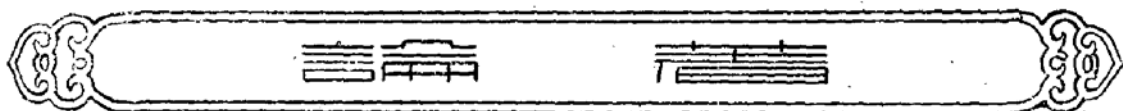
目 录

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运用辩证法.....	杜国庠(1)
毛主席矛盾学说的光辉.....	求真(5)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伟大胜利.....	杨群(9)
多谋善断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张江明(12)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发表两周年座谈发言(摘要).....	古子坚等(16)
论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	严克柔(26)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	刘渠(31)
对工农群众理论学习方法问题的看法.....	朱济灵(37)
以什么为中心,从那里出发?.....	曾树材(38)
先精通然后才能运用吗?.....	王琴(40)
略论中国农民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	唐陶华(42)
自我批判和答辩.....	刘节(47)
谈“事后诸葛亮”.....	杜守素(51)
路线·方法·干劲.....	贺青(53)
“两种价值转移”的论点是错误的(读者中来).....	徐铁驷(55)

附:梁克同志的来信

动
态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二周年,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配合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学习运动,广州哲学学会决定广泛开展学术活动
广东历史学会座谈我国农民战争发展规律问题



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学习运用辩证法

杜 国 庠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两年以来，在我国人民的实践中，起着伟大的作用，并且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伟大的作用。

毛主席的这一伟大著作，是运用辩证法，特别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典范。在这一著作发表两周年的今天，从这一著作中学习毛主席运用辩证法，对于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辩证法，首先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灵魂——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又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

体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在这里，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在客观实际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必须大胆地承认矛盾，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进而正确地处理矛盾和解决矛盾。否认矛盾，或者否认矛盾的普遍存在，不知道任何社会，包括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地存在着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就使自己处于迷惘和被动的地位，无从正确地掌握方向，做好工作。比如人民公社内部，公社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就有矛盾，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矛盾，或者回避这些矛盾，我们就不能及时解决矛盾，人民公社就不能前进。反之，我们善于发现矛盾，并正确地加以解决，人民公社就可以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个道理，已经为我们无数的实践所证明。

因此，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运用辩证法，首先就

要学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大胆承认矛盾，分析矛盾，从而正确解决矛盾。

二

毛主席曾经在“矛盾论”中引用过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伟大著作中，毛主席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从而从原则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提出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科学结论（理论）。

当我们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时候，首先就会碰到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人们对于事物是有认识能力的，但是由于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和它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主观努力不够，不在实践中对事物进行不断的观察，主观认识就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在实践中重新对事物进行观察，使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一致。

要在实践中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是一贯强调调查研究之必要的，他谆谆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矛盾呢？如果有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呢？对于那些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用些什么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当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充分的材料进行分析，终于获得了无可怀疑的正确结论。

要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还必须抓住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人民内部有矛盾，这是全世界一切国家都一样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以及解决不同矛盾的方法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不作具体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毛主席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作了具

体的分析研究，科学地区别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要用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至于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就矛盾的性质来说，是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但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使我们有可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

具体地分析事物要求结合着时间、地点、条件来看问题，同时又要根据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转化来考察问题。比如人民这个概念，从抗日战争时期到现在就有了发展变化。但是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人民就是人民，这个概念的内容什么时候都没有变动；因为他们孤立地、静止地来看，把它看作永远不变，同外界事物毫无联系的东西。其实，任何事物都同外部事物有联系，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这就是条件的问题。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们要正确认识事物，就要结合了解这些条件。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作深刻的认识，也要有历史观点，发展观点。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这种方法归结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我们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党外，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处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党群之间关系，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官兵之间的关系，处理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得到了伟大的成功。两年来，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广了这种方法，在整个人民内部加以运用，这种方法也就发展得更加完整了。毛主席正是既调查研究了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总结了历史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經驗，因而就能系统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我国革命实践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

毛主席在这一著作里面，強調要全面看問題。要不仅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条件发生变化，矛盾就随之轉化。毛主席說：“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結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毛主席在这里指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对抗性矛盾可以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为了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致轉化为对抗性矛盾，我們必須努力創設条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当这种轉化的现象已經出现的时候，就应该积极变坏事为好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常常談到在这个场合下如何如何，在那个场合下又如何如何，这也是重視条件。这次本省发生特大的洪水，这是坏事。党及时地领导人民防洪救灾，领导干部亲自出动，同人民群众一起奋战，使人民看到党和政府对人民所受灾害是全力以赴地支援的，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的，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和提高了灾区人民战胜灾害，迅速恢复生产，力争晚造丰收，弥补早造損失的信心，因而使坏事又变成好事。談到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問題，我們很容易想起“塞翁失馬”的故事。当然，塞翁失馬的故事，严格說来，还不能体现唯物辯証法的科学精神，因为它里面包含許多偶然性：塞翁失馬，馬跑回来并且帶了一只良駒，塞翁儿子跌跛了脚，免兵役保存生命等都不是必然的，并且这故事的发展，完全沒有涉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沒有說明人可以創設条件，改变条件，使坏事变为好事，防止好事变为坏事。而毛主席教导我們的，則是既要看到矛盾的互相轉化，又要發揮人的主观能动性，創設条件，使轉化引向有利的方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总的精神是在于：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發揮一切可能發揮的积极因素，来进行建設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文化。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实质上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綫的問題。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毛主席特別強調了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說：“我們在計劃、办事、想問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們的本錢”。毛主席还严厉地批判了“小圈子主义”，他說：“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越紧縮得越小越好”。他还进一步指出：“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們，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轉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設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党的群众路綫工作方法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要发动群众，并且把发动起来的群众的积极性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还必須解决两个問題，一个是多謀善断，一个是要有发动群众的正确方法。

所謂多謀善断，本身就包含有辯証法。因为要多謀才能善断，不多謀就不能善断。要做到真正的多謀善断，一定要走群众路綫，因为既然要多謀，就不能光靠一个人动脑筋，要“善”断就不能“独”断。最近我們做工作提倡“四共同”，就是和群众一道，共同討論，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負

責。这就是由謀、斷、行、責都走群众路綫的好方法。

多謀善斷，要求我們做“事前諸葛亮”也要求我們做“事后諸葛亮”。我們經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人們对于那些在事后議論工作的成敗的人，都給他一頂帽子，叫做“事后諸葛亮”，言下之意，是頗不以為然。其实，事前諸葛亮固然需要，事后諸葛亮也很需要。事前諸葛亮是事前的多謀善斷，事后諸葛亮則是事后善于總結經驗，得出教訓，以便改进工作。諸葛亮本人，也是“事前”、“事后”的統一。他既能在事前做到“料事

如神”，也能在事后接受教訓。这在“三国演义”上就有不少的描写。毛主席那个“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的著名公式，就是事前諸葛亮与事后諸葛亮的統一。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有着丰富的認識辯証法、思想辯証法和实践辯証法，两年来，这一伟大著作指导了我国各方面工作，取得伟大成就。只要我們認真地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們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

紀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发表二周年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举行座談会

广东省社联筹委会、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本刊編輯部等单位，为紀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发表两周年，于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邀請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別举行了两次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中心的座談会，到会的有七十多人。在二十二日座談会上发言的有中山大学校长許崇清、省政协副主席蕭隽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罗明、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廖奉灵、广东粤剧院編导陈西名、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杜伯奎、省委党校政治經濟学教研室主任卓炯、暨南大学副教授丘陶常等。在二十三日座談会上发言的有广东师范学院院长龙世雄、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吳枫、广东省教育行政学院教务长古子坚、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周輝、中山大学哲学教研組組长刘嶸、广州日报理論宣传部刘启扬、省委党校李思文等同志。另有徐昇、杨奎章、章沛等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到会发言的同志一致認為：毛主席这一著作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經驗的總結，是創造性的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实际問題的典范，是“矛盾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著作发表两周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輝煌成就，特别是去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它的伟大力量并将繼續發揮这种力量。因此，認真学习这一伟大著作，以毛主席的矛盾学說来指导我們的实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矛盾学說的光輝

求真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发表两周年了。在这一思想照耀下，我国人民经历过伟大的实践，并在思想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經濟战綫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社会主义全民整风运动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說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級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全党的思想作风經過了一次比較系統的整頓后，在新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的团結、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結，人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从来沒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①

全民整风运动胜利的伟大意义，不仅仅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了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高涨、人民内部的更加团結，而且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問題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两年来的經驗充分表明：解决了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前提；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否則，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不够巩固的。过去两年来的經驗还証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創造了无限宽广的场所，这当然又是极其重要的前提；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及时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解放人們的思想，并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否則，工农业等各项生产建設事业的大跃进的形势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形成的。而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形势，以及所取得的国民經济发展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整风运动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說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已經深入到群众，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为全党全民所掌握，并发挥出越来越强大的物質力量。这是我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設繼續走向胜利的思想保証，也是广大群众大力地开辟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关于区分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学說并不是近两年来才提出的，是我国几十年革命的經驗和几年来建設經驗的总结，是最完整的、久經历史考驗的真理，是同“左”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科

^① 毛澤东：“介紹一个合作社”，“紅旗”第一期第三頁。

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①这是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一条最根本的准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根本的立场。这一个根本观点，远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就曾经十分强调地指出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②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及其伟大的意义，已为我们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凡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真正的朋友，以击败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反之，如果拒绝执行或者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时候，就会犯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失败。各次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首先就是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分不清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或者分不清谁是我们的真正朋友，因此，不能争取、团结最大多数人，以战胜我们的真正敌人。

为了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战胜我们的真正敌人，我们就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的经验。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存在的这种性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客观的现象。我们能正确地认识与处理它，但不能否定它。从我们党在成立的时候起，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摆在我们党的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可是，各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他们否定了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采用了压服的、强制的、吓唬人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实行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的政策，采用了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党内的是非问题和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结果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伤害了党的元气，造成了令人极可痛心的损失。同一切“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恰恰相反，毛主席教育了全党，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了党内的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及其他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我们的真正朋友，战胜了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当着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英勇的斗争，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全国人民获得解放以后；当着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国已经从解放社会生产力进而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

^①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下凡属引自本书的引语，都不加注明。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沒有徹底完成)，因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占着比較顯著的地位，成為眾人所關心的問題。就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毛澤東同志根據新的形勢、新的歷史條件，概括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為了實現這個總方針，又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對它作了系統的科学論證。

毛澤東同志卓越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進一步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從理論上闡發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那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客觀法則。從這個根本觀點出發，毛澤東同志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實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幾個並舉，即：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在這一整套的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的指導下，幾年來，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在我們的大地上出現了使庸人目瞪口呆的許多創舉，創造出許許多多使敵人膽戰心驚的奇蹟。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關於實現總路綫的幾個並舉，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學說，豐富與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它照耀着我們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

毛澤東同志關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學說的正確性和它的偉大力量，已經完全為我國兩次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證明，並在實踐中得到了偉大的成功和發展。但是，曾經有人懷疑，至今仍然有人擔心：公開承認人民內部有矛盾。揭露工作中的問題、缺點或錯誤，會不會被反社會主義分子、現代修正主義分子利用，以歪曲和擴大人民內部的矛盾，使黨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羣眾的關係遭受破壞？人民內部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沒有矛盾，就不能發展，不能前進。我們人民內部的關係問題所以能保持正常的健康的發展，團結一天天的鞏固，恰恰是因為我們敢於正視矛盾，認識了矛盾的規律性，從而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解決矛盾，不斷加強了各族人民的團結。至於敵人的歪曲、咒罵，那絲毫都無損於毛澤東同志思想的光輝。其實，從我們黨領導人民大革命的那一天開始，各式各樣的反動分子就天天在咒罵我們，從政治上、軍事上進攻我們，製造種種陰謀破壞活動，企圖毀滅我們。結果是怎樣呢？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枉費心機，以失敗告終，而革命則一次又一次地勝利了，毀滅的是敵人，勝利的是我們。如同毛澤東同志其他一切理論著作一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是在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綫的鬥爭中發展與形成的，從而又指導着鬥爭以贏得新的更偉大的勝利。這恰恰是我們黨的理論建設的特征，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道路。

曾經有人懷疑，現在仍然有人懷疑：公開宣傳社會主義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會不會貶低或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會的。任何社會都必然以矛盾作為社會發展的动力。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是基本相適應的，但又有矛盾，這種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關係，恰恰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認識與掌握了客觀規律，才能確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及時改進上層建築某些不適用於的部分，使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斷完善，從而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制度，發揮它無比的優越性。諱言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或者否定矛盾，其結果必然會引起理論上的紊亂和工作上的盲目、被動，這對於社會主義的事業是極其不利的。

有些人仍然不习惯于采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担心会由此而助长极端民主和分散主义，破坏统一纪律，从而削弱党的领导作用。这更是错误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是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关系，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然会遭受破坏；或者是产生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或者是滋长独断专横等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以至削弱党的领导。唯有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坚持集中与民主的统一才能分清是非问题，消除各种不良倾向，巩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有些人所以存在类似上述那些不正确的认识，这同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性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注意克服个人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性，自以为是，思想就会硬化，成为严重的主观主义者。其结果必然是：一，不尊重实际、不认识客观实际；二，不尊重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三，从而把自己的脑子封闭起来，当然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既离开了唯物论，也违反了辩证法。

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必须认真地宣传、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要注意宣传、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地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全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思想光辉照耀之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一个比一个更加全面、更加伟大的胜利。

配合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学习运动

广州哲学学会决定广泛开展学术活动

七月二日，广州哲学学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决定该会最近一个时期的学术活动，以配合省委关于在干部中开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运动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来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会议强调哲学研究活动必须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并确定第三季度活动内容：一、组织会员认真开展学术研究，并把研究心得写成文章。研究内容着重从“实践论”研究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矛盾论”研究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等问题。还将组织几个报告会，辅导部分会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阐明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二、组织几个小型的学术性座谈会，初步探讨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立场、世界观的关系；唯物论、辩证法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正确理解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三、交流学术情况，逐步积累资料，组织协作。四、为了进一步开展学术活动，必须健全会员组织。决定在学会下面以高等院校和省委党校、市委党校的原有会员为基础，组织若干个会员小组。小组任务主要是：在原单位的党委领导下作为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助手；组织个人或集体写出一批有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的文章；经常给学会反映学习中的动态、思想情况以及争论中的问题等。（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伟大胜利

杨群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两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实践，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著作的正确性，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两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欣欣向荣，同样证明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完全正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促进艺术繁荣和科学发展的方针。正如毛主席所指出，这一方针，“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在文艺领域里，在全民大跃进中，六亿人民思想大解放，工农劳动人民也积极参加到文艺活动中来了。全国各地大搞民歌创作，工农群众诗兴勃发，蔚成一代诗风。工人在写工厂史，农民在写公社史，干部和革命战士在写革命回忆录。专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全民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号召鼓舞下，发挥冲天干劲，着意精雕细刻，各种形式各种风

格的文艺作品正不断涌现。在科学领域里，最突出的事实就是群众性的技术革命高潮的出现，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空前高涨，人人提倡议，事事讲革新，大破陈规旧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新风尚。但是，我们并不是蛮干盲动的，党及时地教导我们，革命热情必须和科学分析相结合，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在各项工作中，都在大力提倡讲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培养一种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的气氛。不仅机关干部在大谈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工农群众也在大谈哲学。科学技术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的，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不能不促使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和伟大；同时也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科学繁荣昌盛的生动写照。

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大跃进，带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经验。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对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现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些经验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加强党对文化和科学工作的领导；

必須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綫；必須学会运用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須使文化活动和生产建設有适当的安排，在文化学术工作中，要学会“用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法。

必須坚持党的領導，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条件。我們必須坚持放社会主义的百花，坚持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而爭鳴。反之，是毒草就必須鋤掉，是破坏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論就必須斗争。这个問題，几条界綫，經過反击資产階級右派的斗争，我們應該都明确了。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过渡时期中，階級斗争並沒有結束，特别是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意識形态方面的斗争，更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我們必須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領導，紧紧地依靠党，經常开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两种路綫的斗争，才能保証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迅速繁荣。离开了党的領導，就必然要犯錯誤，必然一事无成。

坚持群众路綫，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在群众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們的文化和科学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无产階級的文化和資产階級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文艺和科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不是只依靠几百、几千个艺术家和科学家所能实现的。必須依靠千百万群众，掀起群众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才能实现。我們这样說，并不是否定或輕視专业的作家、艺术工作者、科学家的作用，但是他們必須与群众相結合，必須政治挂帅，紅透专深，才能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对社会主义作出貢獻。

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始終貫徹着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認真学习和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正确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对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繁

荣，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本質上有別于敌我矛盾，在思想領域內，这种矛盾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中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間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特定意义上說，也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間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不是靠压服，而是靠說服，靠批評和自我批評，靠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的“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方針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发展繁荣，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承認客观存在的矛盾，承認对立面，并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促进对立面向先进的方面轉化。至于科学上的不同学派，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往往不一定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問題，这就更加應該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通过自由竞赛，来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昌盛繁荣。有些同志在思想上还是个“小脚婆娘”，就是怕“齐放”，怕“爭鳴”；或者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东西，輕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从思想方法的根源上說，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在思想方法上还存在着简单化、片面性的毛病，企图用行政命令来解决科学文化上不同意見的爭論，或者片面地看待問題。例如，強調文化的普及，就忽視巩固和提高；強調走群众路綫，就否定或輕視专家的作用；強調敢想敢做，就以为可以不要科学，不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或者倒过来，強調了后一方面，又忽視了前一方面。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化、片面性，往往又容易产生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例如，提倡文艺工作必須走群众路綫，就要求“人人写詩、人人跳舞、人人唱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和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相容的，都是对貫徹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不利的。我們應該認真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其

他著作中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來指導我們的科學文化工作，正確地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為了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促進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的繁榮，還需要重視解決工作方法的問題。這就是要在文化學術工作中，學會“用兩條腿走路”的工作方法。

經過1958年的大躍進，特別是經過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全面大躍進的總結，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用兩條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針，使我們在處理文化與生產的關係問題上，在處理文化工作的內部關係問題上，有了更全面的認識，積累了許多經驗。在文化與物質生產的關係上，社會主義的文化是為政治、為生產服務，為生產者服務的，任何時候，生產必須擺在第一位，是“群龍之首”；文化藝術只能是生產的反映，同時並為生產、為生產者服務。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工作只能是“龍尾”，應該懂得“認路”，不能要求齊頭並進，更不能喧賓奪主。但是，在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群眾，傳播先進經驗，鼓舞革命熱情這一作用上說，文化工作又是旗鼓先行的“龍首”。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和生產的關係，在應該認路的時候必須認路，在應該先行的地方必須先行。如果在應該做“龍尾”的地方爭做“龍頭”，或在應該做“龍頭”的地方甘做“龍尾”，都會犯重大的錯誤。只有把文化與社會生產的關係擺得正確，才能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

在處理文化工作的內部關係問題上，首先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多種形式和風格，通過各種不同形式和不同風格的自由競賽，斗艷爭妍，來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中國是個六億人口的多民族的大國，歷史的傳統又是如此悠久深厚，文化的種類、形式和內容也極其豐富多樣，這就必須貫徹

執行“百花齊放”的方針，使各種文化藝術的形式發展得到必要的條件，這樣，社會主義文化的形式和內容，一定會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豐富、更燦爛。任何憑借行政命令或個人愛好，對不同形式和風格的文化藝術採取粗暴態度的做法，都是違背“百花齊放”的方針，都是對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化極其有害的。在文化工作中，還應該學會用“兩條腿走路”的工作方法，譬如，既要大力普及，又要鞏固提高；既要堅持群眾路線，依靠群眾，又要很好培養專家，很好發揮專家的作用，使群眾與專家相結合，普及和提高相結合。在文化工作的安排和發展計劃的執行上，既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力爭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又要勞逸相宜，心情舒暢，留有余地，善於珍惜群眾的積極性。在文藝創作上，既要講究思想性，又要講究藝術性，使我們的文藝創作不僅能充分反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面貌，同時在藝術技巧上達到和這個偉大時代相稱的水平；在創作態度上既要發揚創造性，敢想敢做，破除迷信；又要實事求是，科學分析，嚴肅認真，精雕細刻；既要浪漫主義，又要現實主義；既要繼承傳統，又要有所創造。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普遍原理來指導文化科學實踐的重大發展。繼續貫徹執行這一方針，必將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不斷發展繁榮。自然，在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過程中，會碰上各種困難，新生的東西也可能要經過比較粗糙和不成熟的階段，但是，只要它是人民需要的新生着的東西，它就是不可戰勝的。封建文化經過了二千年、資產階級文化經過了二百年，才達到它們各自的爛熟時期，並隨即開始走向沒落。我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科學，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導下，肯定會在更短得多的時間內，攀登上歷史的最高峰，並以自己無窮的生命力，創造無限的未來。

多謀善斷与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

张江明

“实践論”这部伟大的著作就是党内两条政治路綫和两条認識路綫的斗争在哲学上的总结，是一场关于如何認識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如何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合結的大論战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实际經驗的总结。这个总结完全証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路綫的正确性，并从世界观和認識論上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用辯証唯物論武装了全党的思想，給予我国人民以正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

毛泽东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理論家。他善于总结实际經驗，吸取人民的語言、古人的語言，极其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多謀善斷”、“善于观察形勢”、“当机立断”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成語。最近，毛泽东同志把它运用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来，給它以新的生命，发展了它的内容，使它融化到辯証唯物論認識論里面，成为“实践論”的发展。

“多謀善斷”是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是从感性認識进到理性認識的必經过程，是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使主观認識和客观规律相一致的重要方法。

多謀，首先要善于在实践的基础上多方面思索，用脑筋多想、敢想和苦想，以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人們在实践的过程中，开

始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这些东西尽管也反映了事物的一个側面，是認識事物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我們停留在这个感性認識阶段，并拿这种認識作为决定方針政策和計劃的依据，必然会使主观和客观不一致。認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现象看到本質，从外部联系找到內在的规律性。然而，事物的规律，不是浮在表面，一望而知的，而是深藏在事物的内部，眼睛看不见，用手摸不到的。当你沒有和他相违背时，象是不感到它的存在；一当你违犯了它，立即就突出地显露出来，給工作造成損失。要能够認識和利用客观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这些规律虽然象是难以捉摸，“但若用心去想一想，都可以了解，也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这里的关键，是在“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詳細占有材料，好好地謀了又謀，想了又想，比較又比較，分析又分析，进行判断、推理和科学的概括。

要多謀，必須多作科学分析。我們做工作，办事情，經常遇到一大堆問題，一系列矛盾。如何正确地認識这些問題，解决这些矛盾，就得謀一謀，想一想，作一番調查研究，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因为矛盾是普遍的，但各种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時間、地点和条件，都有它的特殊性。拿一个公式到处乱套是不行的。例如密植，在不同的土質、水源、气候、肥料等条件下，应有不同的规格，不是千篇一律地越密越

好。同一种种子，在北方是良种，在南方也许就是劣种，或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后，才能成为良种。这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只有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才能认清它的内部联系，抓住它的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的处理。

作好科学分析，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面对着许多材料，纷纭复杂，其中有的是真象，有的是假象；有的是精华，有的是糟粕；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怎样来分清是非，找到它的规律性呢？这就要多作分析，就要多谋，也就是说，要“……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实践论”）做这一番工夫，极其重要。这是科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也是多谋的基本要求。

科学分析和阶级分析是分不开的。在阶级社会里的人，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而人的思想和观点，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的人笼统地对待群众意见，不分析它是代表那个阶级的群众意见，其结果往往把富农和资产阶级的要求也当作是基本群众的要求，这当然是错误的。还有的人把凡是和自己不同或反对自己的意见，都看作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意见，这也是一种错误。对待群众的意见，要作阶级分析。因为在群众里面，有不同阶级的群众，有同一阶级中的先进群众和落后群众，还有多数群众和少数群众，等等。要分清属于那个阶级的群众，什么样的群众，以及群众的多少，就要多谋，认真作阶级分析，才能认清群众意见的阶级本质。那些对待群众意见的简单化绝对化的片面性的做法，是违背科学分析的。

要多谋，不但个人谋，还要与人谋，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所谓多谋，最根本的就是有事和群众商量，认真走群众路线。谋的过程，就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分析和概

括，再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多谋，固然要靠个人多想苦想，但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也不是闭门造车。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伟大的，脱离了群众来多谋，就要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谋出好的结果。要使我们的认识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一定要多谋于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事事走群众路线。人多，议论多，办法也多，有利于克服个人认识上的片面性。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和两种人谋：一是和领导谋，有重大问题向上级请示报告，领会党的政策和指示。二是和群众谋，特别是和基层干部和工农群众共谋。他们直接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依靠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补充。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着我们的任务、计划没有和群众见面时，往往心中无数，把握不大；一经交给群众讨论，认真地和群众谋一谋，大搞群众运动，工作任务就能出色地完成。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所以，既要和领导谋，又要和群众谋，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这是多谋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由于群众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要多谋于群众，就必须不仅听顺耳的话，还要听逆耳的话，尤其是要耐心听反面意见和尊重少数人意见。因为有了各种不同意见，就树立了对立面，有了比较，使矛盾的各个方面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也就更容易认识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如果只愿意听相同的意见，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有陷于“偏听则暗”的危险，难于认识事物的真象。多数人的意见一般多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是错误的，而少数人有时却是正确的，因此，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很有必要。

二

能够多谋，并不一定能把工作做好，还

必須善斷。多謀和善斷是一個統一的認識過程，不應分割開來。

所謂善斷，是說善于從實際情況出發，判斷是非，找出事物的內在聯繫，作為行動的嚮導。我們想了許多問題，看了大量材料，听了各方面的意見，誰是誰非，就要作出判斷。如果只是多謀，却不能正確地決定問題，貫徹執行，這就會變成好謀無斷，坐失良機，貽誤工作。

判斷得是否正確，主要看我們的思想是否如實地反映客觀實際，符合事物的发展規律。客觀規律是離開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多謀善斷就是正確的反映客觀規律，利用客觀規律為人類謀福利。正確的判斷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根據事物的規律來制定方針政策。有些計劃和措施脫離實際情況，違背客觀規律，不能實現或完成得不好，都是由於判斷錯誤的關係。毛澤東同志“在晉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毛主席這段話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客觀實際的範圍是很廣泛的，從個人來說，“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毛澤東），自然，就整個社會來說，還要包括物質條件和群眾覺悟水平。人民群眾是物質生產和文化財富的創造者，是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決定力量，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眾的自覺和自願，離開了這個條件，就會一事無成。從這個意義來說，所謂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主要是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當時當地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以及絕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如果我們作出的決斷，符合於這些原則，就可以說是善斷。相反，脫離了群眾的覺悟水平和大多數人的要求，只憑個人或少數人的意見、利益作決定，強迫群眾執行，

這就是主觀武斷，嚴重的脫離了實際。

善斷，還必須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人們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在一定環境一定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任何工作都離不開形勢。善于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根據各個時期形勢的特點來當機立斷，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

客觀形勢總是不斷地變化發展，有時是瞬息萬變，稍縱即逝的。錯過時機，不僅不能做好工作，還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失。同一件事，由於形勢不同，對它的判斷就不同，處理的方針也不同，其所產生的效果當然也不一樣。例如，同樣的一個口號，過早提出，就會跑得太前，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覺悟水平，勉強去做那些暫時做不到的事情，必然要犯“左”傾冒進的錯誤；提得過遲，失去時機，落在形勢的後面，就不能當促進派，對工作起促進的作用，給工作造成損失，這是右傾的錯誤。所以善于選擇時機，掌握火候，斷得及時，這是一種領導藝術。在實際工作中學會和運用這種藝術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當機立斷，首先要善辨風向，具有為真理而衝鋒陷陣的精神。如果吹的是東風，就順風前進；是西風，就逆風而行，敢于抗住潮流，不“看風頭”辦事。

我們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掌握時機。許多革命工作和生產建設都有強烈的時間性，過早和過遲，都會勞而無功。擇定適當時機去做，就會事半功倍，保證能得到良好的結果。斯大林指出，善擇時機，是無產階級戰略指導的重要原則之一。毛主席提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每年看前冬。這是一個掌握時機的方法。時機選擇得好，把握就更大了。全面規劃，一年至少檢查四次，年終評比。這也是掌握時機的一種方法。這樣及時總結經驗，把全局和局部都掌握起來，發揚成績，糾正缺點，就能使幹部和群眾斗志昂揚、精神奮發地去完成任務。

善于断定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即中心工作，也是善断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存在许多矛盾。要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断定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善于抓住中心，以便通过“纲举”，达到“目张”，这是做好工作的首要问题。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中心工作），其他矛盾才容易得到解决。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失去中心，“多端寡要”，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矛盾的。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党提出“以纲为纲”的方针，正是抓住了工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有了纲，才能把机械、电力、煤炭等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带动起来；由于机械、电力工业的发展，就能帮助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使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主要矛盾是客观存在，但要断得准，抓得住，并加以解决，这不是简单的事。必须下一番苦工，对各方面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侧面作深入研究，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才能找得到。那些“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作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性，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矛盾论”第17页）的做法，是没有办法断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能抓住中心环节，也就无法正确地解决矛盾的。

当断定主要矛盾以后，就要抓得突出，抓得切实；要决心大，用力足，抓到底。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中心。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进行，为中心工作服务，不能妨碍中心工作。当然，也不能把中心工作孤立起来，“单打一”的工作方法是不成的。中心工作必须和一般工作相结合，没有一般，也就无所谓中心。牡丹虽

好，还须绿叶扶持。孤立的搞中心工作，那是不会把工作搞好的。一般工作有时要为中心工作开路，有时又要为中心工作让路。

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相结合，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的工作方法，都是这种抓住主要矛盾来推动工作的方法。在一切工作中都有先进、中间、落后的区别，里面就有对立面，有重点。我们抓住重点，带动一般，就能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抓两头带中间，抓中间带两头、抓先进带落后、抓落后赶先进，也是一种抓重点带一般的工作方法。但以那一个为重点，怎样促使对立面向先进转化，需要根据矛盾的特点和各个时期的情况而定。

既能多谋，又能善断，认识的任务是否完结了呢？没有，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多谋善断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是否谋得准、断得正确。就一般来说，谋与断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少有的，部分地不符合，甚至大部分不符合是常有的。为了克服谋与断中存在的缺陷和片面性，就要通过实践，使它在实践中得到纠正、补充和发展。因此，要反复地谋、反复地断，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谋与断也要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谋与断之间有着辩证关系。谋是断的基础，断是谋的目的。有谋无断，就会变成优柔寡断，犹疑不决，坐失时机。有断无谋，就会变成主观武断，盲目行动。谋是为了断，推动断；断又促进谋，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谋。

谋与断是统一的，这统一的基础建立在实践之上。谋的过程，断的过程，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践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来源。掌握了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谋得多，断得准，即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如此不断地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兩周年座談發言

編者按：為紀念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兩周年，廣東省社聯籌委會、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和本刊編輯部等單位，於六月二十二日和六月二十三日先後邀請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舉行以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為中心的兩次座談會。現將會上發言摘要刊載于下：
(按姓氏筆劃為序)

古子堅：

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著作中，創造性的運用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它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具體的分析了我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提出了處理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針、政策和方法，從而大大的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主要有：（一）從實際出發、承認矛盾而不掩蓋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有矛盾。我們只有具體的觀察和分析客觀存在的矛盾，區別不同性質的矛盾，找出正確處理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才能不斷的推動我國社會向前發展；（二）矛盾是發展變化的，一切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

相轉化。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學會善於分析矛盾轉化的條件，並在客觀可能的範圍內，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創造這些條件，促使矛盾向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方向轉化；（三）要多謀善斷，這就要學會全面地看問題；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善於從錯綜複雜的客觀事物中，通過科學的分析，發現事物的矛盾和本質，抓住其中主要矛盾和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正確的判斷來加以解決；（四）與人通氣，听取多方面的意見，注意其中的反面意見。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兼聽不要偏聽”，“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要聽逆耳之言”。只有與人通氣，對不同意見作多方面分析比較，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更好的把工作搞好；（五）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堅持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這種方法也就是群眾路線的方法，毛主席把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並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著作中明確的指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的運用這個方法，”“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如果“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強制的方法去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前年全民整風運動的實踐證明，採取這種方

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我国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了去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解决工作上一切存在问题的犀利武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刘 焯：

毛主席的矛盾学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乃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保证。

今天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起了难以估计的伟大作用。但是，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完全认识和掌握了这个思想。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夸大了人民内部矛盾，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带有敌我性质的矛盾。从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不是采取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粗暴的强迫命令的方法，这就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而且破坏人民内部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种人，不敢公开承认或者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只看到人民内部的统一和团结的一面，看不到人民内部还有一定的矛盾。这种人在矛盾面前，就会缩手缩脚，不能分析研究矛盾的性质，提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而陷于被动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他们“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也不了解“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

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其实，矛盾毫不可怕。矛盾是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之中。认识了矛盾，就支配了矛盾，并使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主要表现在适合与不适合、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等等。这些矛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可以解决的。矛盾的发现与解决，就是适合克服不适合、积极克服消极、先进克服落后、正确克服错误的过程，是人民内部日益统一和团结的过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和发展的过程。

刘启扬：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懂得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这也是认识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不彻底性的表现，这种人在实践上必然使自己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陷于被动地位。毛主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他指出目前在我国的 社会里，除了存在着敌我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永远存在。毛主席的教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正视客观存在着的两类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好唯物辩证法，并在实践中把它坚持到底，而不要当“承认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规律

又是一回事”的不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毛主席在這一光輝的著作中，不僅科學地、具體地分析現階段我國社會的矛盾，而且提出：“……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例如對待思想問題就不能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採取討論、批評、說理的方法，又如處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壞事和好事的互相轉化問題……等等，毛主席都作了精辟而詳盡的分析。毛主席這部著作可供我們學習的唯物辯證法太豐富了，我們必須認真的自覺的學習。

丘陶常：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來說，也極其重要。毛主席說：“我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裡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明白地指示我們：從舊社會來的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必須認真改造，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而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則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應該按照說服、教育的方法，即又團結又鬥爭的辦法來解決。

解放以來，舊知識分子在黨的長期關懷和教育下，經過了思想改造與參加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及政治理論和時事政策的學習，在政治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經歷了偉大的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受到了極為深刻的階級教育，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劃清界綫，向黨交心，接受黨的領導，決心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服務。在去年大躍進中，一部分舊知識分子下放到工廠、農村，與工人、農民共勞動，同生活，初步糾正了過去輕視體力勞動與勞動人民觀點，勞動觀點與階級觀點也初步樹立起來，

大踏步向左轉。這些說明舊知識分子有改造的可能，從這方面也證明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偉大勝利。

周恩來總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指示我們：“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經過三條道路：一條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條是經過他們自己的業務的實踐；一條是通過一般的理論學習。”因此我們必須遵照這個指示，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學習專業的理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來批判和清除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與教育思想；熱烈參加勞動鍛煉，建立四大觀點；並在對社會生活的觀察與實踐中，加強對國際國內情勢的認識，繼續參加各項政治運動，鍛煉政治立場。以加速自己的社會主義改造。

蕭隽英：

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中指出：“我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裡存在着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

曾經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就其出身和所受教育來說，一般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多數出身於剝削階級，受資本主義的社會教育，他們縱然不占有生產資料從事剝削，但是却以自己的知識為資產階級服務，因而他們構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也具有兩面性，即對於人民革命有其積極、進步、革命的一面，也有其消極、落後、反動的一面。在整風反右以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兩面性依然存在：即一方面表示靠攏黨，承認自己有繼續加強自我改造的必要，

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服务的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共产党不大服气，对党的领导不够信任，怕讲错话，怕犯错误，面对着生产大跃进中某些工作上的一个指头底缺点，心里有意见，却不敢畅所欲言；在学术上也不敢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消极的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这也说明，他们还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毛主席在这一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是属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正如毛主席所说：“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把这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建国以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等政策。这些都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的具体运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的有效措施。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的三个环节，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第一个团结是愿望，第二个团结是目的，批评或者斗争是使愿望得到实现的手段。因此，在进行批评时，还必须注意批评的态度和方式。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呢？这就是“既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反右派斗争以后，党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进一步以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予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鼓励，使他们在服务中自觉地要求继续加强自我改造。但这决不能理解为要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不断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前进，也达不到团结的愿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积极服务中，继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服务与改造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服务是改造的基础，改造是服务的前提。改造得好，服务得更好。服务与改造的过程，是边服务边改造的过程。如果以为，服务的本身就等于改造，或者只要服务，不要改造，都是不对的。应该认识，在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自我改造，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因为服务单位是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经常发生关系的所在，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只有通过各种实践，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在业务工作、政治斗争以及思想感情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最易得到党和群众的帮助和批评，这样，就有利于进行思想上的两条道路、两种人生观、两种方法的斗争，达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目的。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矛盾可以转化”这一普遍真理，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服务的途径，进行自我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是能够逐步改造过来的，他们是能逐步转化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

龙世雄：

我们要不断地把党的革命任务和建设任

务完成得好，就得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从理论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只有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提高工作质量，把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单纯是“方法”问题，首先是立场和观点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唯物论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离开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单纯地钻研方法上的问题仍然是不可能掌握这一科学的方法的。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方法问题，他在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要全党重视这个问题。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行动表现；只有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才能正确改造客观事物。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12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就这样教导我们：“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根据1957年冬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和迎接1958年全面大跃进的建设工程，提出了工作方法问题，从理论上，从实际工作中生动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论、辩证法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方法是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为着完成和超额完成1958年年度建设工程计划任务的大跃进的工作方法，结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局面；当右倾保守思想，迷信落后思想已经大量克服，全党全国人民发挥了冲天干劲，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1958年的建设工程经验，为了迎接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年度计划，注意克服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在党的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工作方法问题，要求全党认真把唯物论辩证法，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具体贯彻、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上。

为着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性）、形而上学（表面性和片面性）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倾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首先要认真体会，掌握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党的总路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工作方法，是一切具体工作方法的总汇、钥匙。

党的总路线本身充分体现了革命精神（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精神（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我们既需要有无坚不摧、无攻不克，“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和首创精神；又要尊重客观事物规律，脚踏实地，按唯物论办事、按辩证法办事，按群众路线办事的老实作风和科学精神。总路线既是一切工作方法的统帅，那么一切工作只能服从它并为其服务；脱离总路线的工作方法，都会变成迷途的羔羊，没有政治挂帅，也必然会在工作上碰钉子，出毛病，走弯路，犯错误。

其次要很好地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必须认真地掌握学习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精神，这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政治理论基础。

陶铸同志最近发表的“总路线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很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已发出通知号召各级干部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明确规定了学习的目的、中心、方法和文件；无疑地，广东各级干部通过这一次学习对广东今后的各项工作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在原来工作基础上，工作将做得更细致，更落实，获得更大成就。

杜伯奎：

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方针。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他过去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在这一篇讲话中，进一步发展这个基本论点：“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既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当然不能例外，也一定会存在着一些内部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不同。又根据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原理，那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存在着解决了一个矛盾之后就万事大吉的错误观念，应该注意到矛盾得到了解决，对立得到了统一，那是暂时的、相对的现象，因此必须注意新的矛盾的产生，找寻正确解决的办法，绝不能麻痹大意，在掌握这一个规律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采取细心观察，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作判断，决定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存在着的矛盾，真正解决问题。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象由于物资供应紧张所发生的人民经济生活问题，由于防洪救灾和增产节约而引起的社路、调整生产、调整购买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能把坏事

变成好事；解决得不好，就会使情况越弄越糟。在文教工作上面，这一类内部矛盾也是存在着的，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质量问题，发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速度问题，发展师范教育与高中毕业生轻视师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和解决。

罗 明：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正确处理各族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各族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过去几年来，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学习不够，对有关民族问题方面的矛盾，缺乏阶级分析，看法不全面，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常常发生片面性或表面性的错误。例如对解放前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片面的过分强调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方面，而忽视了各民族人民密切联系的一面。看不到我国在很远的历史时代，就已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相处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并且多次联合抵抗了外来的侵略，从而共同保卫和开拓了祖国的领土，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革命

斗争中，增强了兄弟般血肉相联的友谊，这是解放前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如果忽视这个主要方面，就会忽视加强民族团结的有利因素。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有时我们又忽视揭露和解决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方面。我们曾经忽视充分发动基本的劳动群众；对上层分子有时偏重于团结而忽视改造和斗争，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如果不解决各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让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长期存在，就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就不可能彻底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

由于民族问题方面的矛盾比较复杂，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看作敌我之间的矛盾；有时又把某些上层反动分子所煽动的破坏活动，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在反大汉族主义与反地方民族主义上，应该着重那一方面的问题，有时也看不清楚。这些都是不利于正确处理各族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的。

今后应如何遵循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的指示，加强我省的民族工作呢？

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今后我们应当继续不断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以适应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跃进的发展形势。首先，一方面应当继续注意敌我矛盾，警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挑拨和破坏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主要是应当继续不断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多民族的人民公社中存在的民族关系问题。今后各族人民和干部，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应遵循毛主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的指示，继续不断克服和防止形形色色的资

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批判的地区，应继续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在那些没有认真检查和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地区和单位，则应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今后只有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才更有利于防止克服少数民族干部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其次，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这是促进各民族繁荣的根本问题。党在关于过渡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中早就提出，在各民族间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以后，主要任务就是逐步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共同建成社会主义。虽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和1958年的大跃进，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目前一般来说还落后于汉族发展的水平。随着各民族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先后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主义制度上，共同性日益增加，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别，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今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鼓足干劲，依靠自己艰苦的努力，并在国家和汉族人民支援下，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于今后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都能赶上或者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共同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相信：在党英明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断调动各族人民一切积极的因素，一定能够实现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完成党在过渡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

卓 炯：

当前人民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我

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的一點體會。

毛主席說：“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以至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毛主席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必須把人民的經濟生活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加以處理。解決人民經濟生活的過程，就是一個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的過程。

但生產與需要究竟是如何不斷出現矛盾又如何不斷獲得解決的呢？毛主席在這段話中，已經把問題的實質恰如其分地指出來了。我們知道，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所以運動、鬥爭是絕對的，靜止和同一是相對的。毛主席說得好：“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我們根據上一年的生產物來制定下一年的計劃，就要確定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由於上一年的生產物是有一定量的，不能增多，也不能減少。這種比例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但是，我們承認計劃的平衡，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平衡。所以毛主席又說：“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就成為不平衡，統一就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

統一。”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有一個特點，就是要爭取超額完成任務。要超額完成任務，就非打破舊有的平衡不可，所以打破平衡，乃是經濟工作的任務。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應該尊重平衡，在什麼情況下，又應該打破平衡。現在看起來，我們必須在承認平衡的前提下去打破平衡。如果你根本不承認平衡，不承認生產物有一定的量，而隨意決定下一年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那末，這就不是打破平衡的問題，而是承認不承認平衡的問題。如果根本不承認平衡，那時就會出現毛主席所說的“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去年一年來，我們一方面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而且成績是九個指頭。但在另一方面，人民的經濟生活也有某些失調現象。原因恐怕就在承認平衡和打破平衡這個界線上沒有掌握得恰如其分。我們在局部問題上破壞了平衡，而不是打破平衡。所以出現了一些缺點，這些缺點，比起成績來，雖然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也需要加以改進。我們要正確處理人民的經濟生活，就必須把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加以貫徹。簡單地說，我們為了打破平衡，必須首先承認平衡，否則就要破壞平衡，就要犯錯誤。

周 輝：

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應當根據毛主席這指示的精神，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普遍真理結合自己的生產單位或工作部門的條件、時間、地點，進行具體的分析，找出它的內在矛盾，以及與自己工作有關的一切矛盾方面，從而找出它的規律性；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大力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泛地發動群眾，並訂出有效的措施，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更好地去解決。

自己工作中的矛盾問題。簡單的說來：要正確的來貫徹總路綫，就需要在自己的具體工作中，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統一起來。

可是在實踐中，怎樣才能保證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的統一呢？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注意“四個結合”，反對“兩種偏向”。所謂“四個結合”，就是：第一，既要有沖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學的分析。即既要有火熱的心，又要有冷靜的頭腦。只有這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做到既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具體的科學的分析，找出它的規律性，又能充分的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把工作做好。第二，既要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又要在戰術上重視困難，既要勇敢，又要謹慎。所謂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就要求我們對高速度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客觀必然性，有堅定不移的信心。所謂在戰術上重視困難，就要求我們在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時，都要小心謹慎。第三，既要提倡苦干，又要提倡實干和巧干。所謂苦干，也就是要求我們發揮沖天的干劲。所謂實干和巧干，就是要求我們既要按照客觀的可能來辦事，又要想出巧妙的辦法。第四，既要見物，又要見人。見人不見物，或見物不見人，都是不對的，因為只見物不見人，就會忽視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更好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影響群眾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相反，如果只見人不見物，就會脫離客觀的實際情況，或者脫離群眾，違反事物的发展規律。要正確貫徹總路綫，還必須反對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只是強調主觀作用，強調沖天干勁，認為指標愈高愈好，而不注意客觀的可能。這種片面強調主觀能動作用，不顧客觀條件和可能的偏向，往往導致“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另一種偏向，就是在目前提倡指標落實和留有余地的时候，有些人过分強調客觀的條件，認為指標愈小愈好，而不注意主觀的努力。這種人只是片面地強調客觀，做客觀規律的奴隸，看不到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可以創造條

件，可以變困難條件為有利條件，從而克服困難，這是“唯條件論”的右傾思想。這兩種偏向都必須批判，才能使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統一起來，才能保證正確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

章 沛：

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面，發揮了有名的“兩點論”。

“兩點論”作為認識客觀實際的方法，意味着要抓現實中的東西的正面和反面，也就是抓矛盾，抓本質。毛主席在著作中層層深入地分析了現階段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提出了兩大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教導我們要學會全面看問題的方法，既要看到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着對抗性矛盾這一面，也要看到還存在着非對抗性矛盾的另一方面。然後毛主席深入地分析人民內部矛盾中所包括的複雜關係，這些關係的正面和反面，這些關係上所出現的矛盾。進一步，毛主席還分析了這些矛盾每一側面之中所包含的兩面性、二重性、或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說明了側面當中還有正面和反面。毛主席全面分析現實的三步驟，教導了我們，如何在複雜多變的情況中，運用辯證法，層層深入地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體、从現象到本質地把握事物的實質和內容。這對克服教條主義、庸俗的機械論、形而上學的錯誤觀點具有重大意義。全面地分析具體情況，才能正確認識客觀，進而正確地解決矛盾。

作為思考問題的方法來說，（一）“兩點論”意味着要从全面的觀點來理解矛盾的事物或事物的矛盾。矛盾本身就具有兩重性，它自身既矛盾，又統一；既相反，又相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記其一，忘了其二，都是“一點論”，都是形而上學。毛主席在自由與紀律、民主與集中、群眾目前利益與國家長遠利益等等問題的分析上，體

現了這一思想方法。(二)從發展的观点看矛盾，也是“兩點論”的具体要求之一。矛盾在不斷轉化中，矛盾的正面會轉到反面（如坏事會變成好事），主觀認識必須看到矛盾的兩重性，才能從規律中預見它們的轉化，跟上客觀形勢的發展。關於這一點毛主席特別強調指出，矛盾是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的。因此，我們既要對矛盾作層層深入的全面分析，又要對矛盾的轉化條件層層深入的全面分析，才能夠使我們充分地發揮人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認識客觀，多謀善斷，創造條件，促進矛盾向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方面轉化，改造世界。(三)當前現實向我們提出許多辯證法問題，例如沖天干劲與科學分析、苦戰與休整、平衡與不平衡等等，都應該運用“兩點論”，從矛盾統一、相反相成、相互轉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和處理。抓了一面，丟了一面；看到統一，忘了矛盾，看到矛盾，忘了統一；看到現在，忘了將來，都是形而上學，都會給工作帶來損失。

在工作方法上的運用方面，毛主席指出：(一)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學術上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教導我們凡事要看正面、反面；意見也應該聽正面、反面。(二)處理問題要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就是說，處理一切問題要有全局观点，要從正面、反面、側面、內面看問題。(三)為了要糾正“一點論”所形成的思想上、實踐上的偏向，必須大力展開兩條戰綫的鬥爭，既要反右，又反“左”；要大力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四)在建設工作上，或在工作中遇到統一基礎上的矛盾時，要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法，用“并舉”，或用“點面結合”的方法來解決。

廖奉靈：

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使我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有進一步的体会。

旧知識分子，由于他們長期受旧家庭、旧社会和旧教育的影响，充滿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观点和感情；所以必須加以改造，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黨採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的知識分子政策，來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通過一系列的政爭和群眾運動，不斷地幫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同時，黨和毛主席一貫十分關懷和信任知識分子，這一切都使廣大的知識分子得到極大的鼓舞。十年來按照毛主席的理論，貫徹黨的政策，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其中有一部分人已光榮參加了共產黨，他們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我也是資產階級旧知識分子出身的，解放後受到黨一系列的教養，在政治上思想上黨給了我十分深刻的教養和幫助，給了我最大的信任。我庆幸後半生跟着了共產黨，使我在旧社会几十年中对教育事業的熱愛，得到了依托，得到了發展。黨對我的信任更使我加強徹底改造自己的責任感。我必須徹底進行立場观点和人生觀、世界觀的改造，否則就有負黨對我的期望和重託。

學習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對自己的啟發和教育很大，批判了過去，認清了方向，看到了將來。我的心情從來沒有這樣舒暢，我把自我改造與黨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緊密聯起來了，今後我一定更好的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改造自己，向又紅又專的大道上繼續前進。

論認識和运用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問題

严克柔

建設社会主义的全部錯綜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客观規律性的过程。新的社会是适应着社会发展的規律，同时發揮人們的主观能动性建設起来的。从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經过去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日益广闊；发生作用的程度日益深远。我們的建設工作，凡是符合客观規律、按照規律行事的，就获得順利的发展；凡是违反客观規律，不按照規律行事的，就一定要受到挫折。

我們是唯物主义者，承認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規律，而任何事物的規律，也都是这个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我們要想办好事情，就要了解和掌握这个事物发展的規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戰略問題”一书中說：“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領導革命战争固然要注意掌握客观規律，領導經濟建設也要注意掌握客观規律。毛泽东同志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时期，就一再提醒我們好好去認識和掌握經濟規律。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名著中說：“經濟建設我們还缺乏經驗，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經驗。对于革命我們开始也沒有經驗，翻过筋斗，取得了經驗，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时间要縮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須懂得，在这个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經濟发展的客观規律和我們主观認識之間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們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毛泽东同志这些意味深长的話，特別在近年来紧张的建設实践中，更使人深刻地感觉到它的巨大的指导意义。

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一样，具有客观的性質，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无论那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人們的意志和意識之外客观存在着的。因此这些客观存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規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人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废除、消灭或改造

經濟規律，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來創造新的經濟規律。但是，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一樣，人們是可以認識並加以利用的。人們可以限制某些經濟規律的作用並給予另一些經濟規律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

但是，經濟規律也有其不同於自然規律的特點。經濟規律的第一個特點是：大多數經濟規律不是長久不變的，它們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發生作用。無論那一種類型的生产關係都有自己所固有的發展規律。因此，經濟條件的改變、一種生产方式為另一種生产方式所代替，將意味着一些經濟規律讓位給另外一些經濟規律。由於社會主義生产關係代替了舊的資本主義的生产關係，表現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剩餘價值規律、平均利潤率規律、壟斷高額利潤規律、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其他的一些規律，就不再發生作用。競爭和生产無政府狀態的規律也退出舞臺。隨着社會主義生产關係的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勞動生产率不斷提高的規律、按勞分配的規律、社會主義積累的規律等新的經濟規律，也就產生和發生作用。同時，由於社會主義制度下還保留着商品生產，因此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仍然起作用，不過在新的經濟條件下，它的作用範圍已經受到限制。當然，除了這些為某種生产方式特有的經濟規律之外，還有為一切社會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如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

經濟規律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經濟規律的利用是具有階級“背景”的。經濟規律只有通過人們的活動才能表現出來。在存在着剝削階級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集團，有的促進某種經濟過程和某種經濟規律的實現，有的則起阻礙作用。舊的、衰朽的社會力量力圖阻礙社會向前發展，力圖保持腐爛和衰朽的經濟條件。一種生产關係為另一種生产關係所代替，即生产方式的更替，是通過革命實現的。先進的社會力量克服衰朽的社會力量的反抗並改變社會生活的經濟條件，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為新的經濟規律的出現開辟道路。企圖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萬古長存的資產階級的狹隘利益，妨礙它去認識和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而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却是和人類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相適應的。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不僅可以自覺地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且還可以充分運用這些規律來為社會謀福利。

社會主義的生产關係沒有對抗性的矛盾，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所武裝起來的人又能正確地認識社會經濟規律，因此，與以前各種社會形態的經濟規律不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不是自發地起作用，而是被人們自覺地利用着，使社會主義日益鞏固和發展，並最後過渡到共產主義。

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告訴我們的一般原理，是“眾所周知”的真理，但是，在千千萬萬人鼓足干劲進行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為了使革命熱情和科學精神相結合，還有反復地進行解釋的必要。

二

但是，光是懂得一般的經濟原理是不夠的，還要懂得這些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在我們具體條件下的表現和作用，懂得如何運用這些規律來促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知道，經濟規律是由它的經濟條件決定的，不僅是有什麼樣的生产方式，就有什麼樣經濟規律，而且經濟規律還因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不同會有不同的反映，不能以現成不變的公式來解

释具体经济生活。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下，一些主要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和作用是怎样的呢？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去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呢？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经济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它既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决定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們得到全面的发展。生产和需要这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对抗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的增长是生产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经常增长的需要现在和将来都会给生产提出日新月异的任务，社会需要不断增长要求生产的不断提高，如果生产不能不断提高，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将引导生产力走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将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地大大地提高，将引导社会走向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們做任何工作都要力求符合这条基本经济规律，一切为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经常教导我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以满足全国六亿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也就是说，我們做的一切工作，无论生产和分配，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照顾到整个社会的需要。为了深入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我們还得经常地去分析这个规律所联系的两个方面——即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研究这个矛盾关系在什么条件下求得同一。我国六亿的人口是众多的，需要是庞大的，但是我国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很低，仍然处于又穷又白的状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需遵循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则，遵循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满足需要的原则。既要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又要适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們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考虑到这一点。譬如要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就要考虑到供给生产以现代化的和最先进的技术，这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是要由重工业供给的。但是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却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也能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种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的办法，可以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些。因而使生产和需要很好地统一起来，并都得到发展。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它的作用。这一规律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作用之后，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来，任何社会形态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都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和生产资料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不过在旧社会，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比例是通过经常的波动、比例失调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发地达到的。在新社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经济结合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它的发展迫切需要按统一的计划来进行，需要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协调一致，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发展。这种协调一致和比例性是保证不断迅速发展生产和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需的，因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实现的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人們迫切要求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条规律，探求它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要求，探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再生产各方面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大中小企业不同的经营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包括着技术的关系，也包括经济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注意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内部的平衡，突出重点，全面安排。党中央提出了以鋼为綱，全面跃进的方针，

同时还要注意到重工业和輕工业之間，工业和农业之間，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間，工业和交通运输之間，生产和基本建設之間，生产和流通之間，生产和消費之間等等的联系，都要作全面的安排。同样，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了以粮食为綱，同时注意安排粮食作物与經濟作物之間、农业和农村工业、林业、牧业、副业、漁业之間的关系，实行全綫的革命。所有这些方針的提出和貫徹，都是从不大明确到明确，从不大全面到全面，从比較粗糙到比較細緻的。通过实践，我們的經濟工作将愈来愈符合于客观經濟規律的要求。

在分配个人消費品方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規律在我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劳分配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經濟規律。因为社会产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資料的分配，同时还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則的时候，就不可能过早地抛弃“按劳分配”的原則；而且在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还必须承認国营企业职工同公社社員之間，这个公社和那个公社之間，这个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那个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之間，以及熟練劳动者和非熟練劳动者之間所存在的劳动报酬的一定的差別。因此按照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分配消費品，貫徹多劳多得的方針，就使劳动者从个人物質利益上去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把劳动者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而那种主张一律拉平的平均主义的做法和想法，都只有带来生产的极大危害，是违反客观規律的，必須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反对。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必須給予注意的商品生产的規律——价值規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价值規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但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价值規律就仍然要发生作用。价值規律要求商品的生产和交換应该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它的作用可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費用，使生产的赢利得到保証。如果我们违反了价值規律，不按等价交換或者竟无偿地拿过来，就必然要引起經濟生活的混乱，使生产受到損失；反之，如果我们很好地运用价值規律，則可以为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和人民生活造福。

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虽然还有許多，都有待我們去研究和掌握，上面举出的几条，是目前在我国經濟生活中起作用較为突出的，更加值得我們的注意和深入研究。

三

正确地掌握社会經濟发展的客观規律，并熟練地运用这些規律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这是我們經濟工作者的重大責任。目前，人們对待經濟規律存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过份強調了主观能动作用，忽視了經濟規律的作用。由于經濟規律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經濟規律的运用已沒有反动階級的阻撓，工人階級当政的国家在組織国民經濟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些人以为国家是“无所不能”的，人們可以不顧經濟規律而“暢所欲言”。他們不知道，人們只有依据客观規律才能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凡是客观規律所允許，只要經過努力就可以办到的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客观条件所不容許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不符合客观規律脱离实际的，这不是真正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規律，合符实际的，真正的主观能动性。前者不顧客观規律，必然会使工作搞

坏，而要吃苦头的。另一种错误的态度是把经济规律偶像化，以为经济规律是作为一种统治人们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人们对这些规律是无能为力的。这样必然会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自流论和自发论的立场上去。恩格斯指出，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人们把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直到现在它们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同人们相对立，——将被具有完备知识的人们应用，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的社会存在直至现在都好像是自然界和历史从上面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东西一样，同人们相对立，现在则成为人们自己的自由的事情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则受人本身的控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所推动的社会原因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反杜林论）客观经济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它不单可以认识，而且可以被人们控制、利用为人类谋福利。人们掌握了经济规律，就能预见经济发展的方向，就能在一切场合下取得主动权，这时候，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认识规律，而且还要运用规律，来达到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要重视马克思的话，我们不仅仅在于认识和说明世界，而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统一起来，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体现了这个统一。

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要把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统一起来，是要经过时间、化费代价、从实践中去解决的。规律就是事物本质的联系，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探究事物本质的矛盾。有的矛盾是不到时间不显现出来的，而且矛盾是会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的表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拿现成的公式去套它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正确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必须做艰苦的工作，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要钻进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不充分揭露矛盾，就不可能掌握它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而且还要考虑到，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作为事物本质联系的规律并不是一下子就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规律要经过千百次反复的出现才会被人们认识，因而，一切经过试验，并按具体条件慎重推广先进经验，就是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以做好工作的一条很好的工作方法。而且，不仅有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的矛盾，还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与不正确的认识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还要多谋善断，与人通气，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加以比较，互相补充，以寻求出一致的正确意见来。总之，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细致工作，使从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以便逐步地掌握客观规律，在客观规律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

刘 渠

民族問題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問題，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就不可能有民族平等与民族和平，因而也就不可能使民族問題得到解决。因为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敌对关系是阶级社会中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以前，那些奴隶主、农奴主不仅奴役其本民族（在严格的意义說是部族）的劳动人民，同时也奴役其他民族的人民；他們經常把被征服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活財富而加以剝削，成为等级制度的垫脚石。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市场的确立，虽然民族間的隔絕性有所改变，各族人民的經濟来往和文化交流也較前更为密切，甚至一些大城市已經成为民族同化的溶炉，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敌对关系，而且使之更加尖銳化。这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乃是資本的化身，它所追求的是无止境的利潤；因此，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它必然要把魔手伸向其鄰国，伸向一切可以侵略的落后国家和民族，这从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說，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就是一手靠着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一手靠着最野蛮的掠夺方法，从落后民族中取得其原始积累的。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的爭夺战就更加疯狂，随而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和剝削也就愈加毒辣和残酷，而这种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也就必然产生它的对立面——民族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故一部资本主义的

历史也就是一部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所以民族問題并没有因资本主义的所謂“文明”而得到解决，相反的，它把民族問題推到更尖銳更显著的地位来了。民族問題只有当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而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为什么民族問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解决呢？因为无产阶级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使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同时得到解放；它不仅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剝削和压迫，而且要使整个社会都永远从阶级压迫和剝削中解放出来。为此，无产阶级就必须一劳永逸地废除阶级借以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既然阶级借以存在的根源消灭了，那么，建立在阶级剝削基础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这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策，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国内民族問題的成就上就可以看出来。人们都知道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最黑暗的民族监狱，在那里被兼并的民族被剝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甚至连使用自己語言的自由也没有；而且他們的生命财产也經常受到黑帮民族主义分子的侵袭和蹂躪，因而造成民族間的深刻仇恨和分离思想。可是革命胜利以后，由于苏联共产党坚决贯彻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使得許多在革命初期已經分立出去

的民族（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等）都回到苏联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来；同时其他许许多多的大小民族也都按民族平等的原则充分得到当家作主的自决和自治的权利，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边疆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这一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就使沙皇时代的民族敌对关系一变而为团结友爱，互相信赖，互相合作的关系。这种民族关系的新面貌也同样出现在已经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以后的新中国。在我们的国家里，民族工作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底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今天我国的少数民族不单在政治上享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权利，成为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而且得到汉族人民无私的援助，通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及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工作，使相隔二个或几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都一同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摆脱了极端贫困落后的状态，逐渐发展和形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因而我们的民族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改过去由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视的关系而为团结友爱的新关系，特别在去年人民公社化和工农业大跃进以后，各民族地区在农庄、矿山、工厂、学校和机关中通过各民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互相支援，互相学习的实践教育，使得民族关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在许多地区，人们已突破了民族界限，不分彼此，实行共产主义大协作，使过去好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土地和劳动力不相适应问题，各种生产专长的相互传授和提高问题，都进一步得到解决。而且由于不同民族成员在同一组织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娱乐的结果，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建立起深厚的民族友谊；同时各民族间生活习惯的差异性也因之而逐渐减少；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

展，并为未来民族大融合培育了幼芽。这种新的民族关系在任何一个民族地区都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某些外国的扩张主义分子却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大叫大喊，说什么汉族人民压迫藏族人民，不让他们自治，这简直是白天说梦。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与民族压迫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存在，如果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是不可能产生民族压迫或民族侵略的，它只有使各族人民更加接近，更加团结和友爱。所以那些歪曲事实的侮蔑，就只能是枉费心机的狂吠而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正是由于它是建筑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所以他们之间不仅不会再有象过去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民族敌视和民族压迫的现象，而且必然出现一种史无前例的团结友爱，互相合作的新气象；走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一个最根本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灭，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跟着消灭”^①从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看来，完全证实了这一伟大的真理。

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族敌对关系的消灭，并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全部解决。实际上民族敌对的关系虽然消灭了，但矛盾还是存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矛盾一般说来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

（一）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残余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在阶级社会的废墟上建

^①“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55页。

立起来的，因此由过去反动阶级所造成的民族间的敌对关系虽然基本消灭了，但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的成见，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了。在大民族方面许多人因受过去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特权制度的影响还会有民族优越感的残余，即对少数民族有一种轻视的成见。同时在少数民族方面，因一向处在被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因而对大民族总是存有一种不信任，或狭隘的排外情绪。这两种心理状态如不加以克服那就会阻碍民族关系之进一步的改善。

(二)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存在——这是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民族压迫制度的结果，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总是不平衡的。因此各少数民族即使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假如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悬殊太远，那就会使一些民族不能充分利用其政治上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这种不平衡也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的一定距离；特别是当一些民族还停留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阶段时，这个距离就会更加显著。

对于上述矛盾应该怎样去克服呢？按其步骤来说，首先，必须坚决贯彻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保证各民族有当家作主的充分权利。在我国来说，就是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从事实的教育中改变其对大民族的猜疑和不信任，从而消除民族隔阂的残余。有人以为我国民族地区在去年大跃进之后，民族差别已逐渐缩小，事实上的不平等很快就会过去，因而对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不那么热心，认为是可有可无。我们认为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由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虽然就我们的民族关系史

来说，还不是主要的一面，但也不是很快就能消除得了的。尽管几年来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在党底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和教育下，民族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人们的民族偏见已经逐渐消除，但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方面已完全没有问题，可以万事大吉，那是不实际的。至于民族差别那就更不是短促的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尽管我们的事业是跃进，大跃进，但仍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过程；忽视了这一点，过早地放松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那是不符合客观要求的。诚然，“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各民族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都已溶合为一的时候，那时民族特点和民族界线也就会跟着消失，“民族”就成为历史上的概念。那时民族区域自治自然也就失去它的现实意义了。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民族偏见的残余和民族差别还存在的今天，抱有那种看法的人那是完全不现实的。今天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需要在已经完成社会改革的民族地区继续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这样做正是为了彻底消除民族隔阂的残余，消灭民族差别，实现民族大融合，以至于为民族消亡创造条件。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辩证关系，那就会成为拔苗助长的愚人。

其次，要在各民族地区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发展的进程是不一致的。有的已经到达资本主义阶段，有的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因此当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不可避免还有些民族仍然是停留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在那些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这种改革不仅为了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也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关系的关键。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或政

治体制,因此,对于一切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阶段的民族都有必要进行社会改革,逐步使之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根绝造成民族对立的根源。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必须实行的,但究竟什么时候实行,这需要看主观和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来决定。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工作是在革命初期即展开对民族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完成的。如苏联就是这样。但在中国因革命经历的具体过程不同,除部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同时进行外,其他民族地区一般说来都是推迟了一步(现在有90%的少数民族已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并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但无论时间的迟早或方式如何,都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是不能动摇的。

第三,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平等问题,同时还必须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换言之就是要把各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加以改变,因为正如前面所述,当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以后,民族间的主要矛盾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即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矛盾如不解决,那就不可能使民族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这个任务仅仅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单干,而没有先进民族之大力和长期的帮助是不容易完成的。所以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先进民族无产阶级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进行帮助,使他们更快的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加强这个帮助也就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通过这个帮助就会使少数民族人民由衷地感到兄弟民族的真诚友爱,就会使他们体会到一个新旧民族关系的鲜明对比,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帮助同时也是争取少数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过程。不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有较大的发展,

那就不可能为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和干部基础,这样就会无形中削弱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力量。所以在苏联和我国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就大力帮助少数民族进行工农业的建设,并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文化,从创制文字,扫除文盲到办高等学校、研究机关这一整套的文化建设任务都把它担当起来。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的落后面貌,而且对消除民族隔阂的残余,加强团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党在民族地区特别强调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底严重意义也就在此。

如前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反映旧民族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残余,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初期不可避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从苏联及我国建国的历史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来。这种思想无疑对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是有很大的妨碍。为此,我们就有必要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残余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这种思潮对于被兼并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从殖民主义中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来说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反动的,有害的。这种思想残余不仅在大民族方面有,在少数民族方面也同样存在,不过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我国来说,这种思想在大民族——主要是汉族——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轻视,认为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起什么作用;在民族工作中,忽视民族特点,硬搬汉族地区的经验;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工作上包办代替;在生活上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在少数民族方面,主要表现在

对汉族人民不够信任，有狭隘的排外情绪，不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帮助；过分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反对进步，保守落后；常常把民族利益与社会主义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等。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是完全对立的；假如让它存在下去，那不仅会腐蚀干部和群众的意识，而且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党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为了顺利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曾特别着重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判，并收到一定的效果。这种做法无疑是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但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却乘此抬头，并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危险。他们借干部民族化的政策，来排挤外来干部，好象是民族地区非清一色的民族干部，就不能说是干部民族化，就不能说是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要求党组织也要民族化。更猖狂的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竟假借民族“自决”的美名来进行分裂主义的活动，公然叫嚣要搞独立国，要搞加盟共和国。一些党内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则大搞其宗派活动，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以实现其分裂祖国的阴谋。显然，当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这个地步时，可说已由人民内部问题转变为敌我问题，如不坚决予以还击，那就会严重地破坏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而且有导致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民族地区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有其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被彻底消灭。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思想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消失了，但思想意识的改造究竟是长期的事情，决不是经过一次反民族主义或反地方民族主义就能彻底解决。要消灭这种思想残余，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而特别重要的就是

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加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各民族虽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国家与过去的国家有本质上的区别。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剥削阶级用以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劳动人民用以镇压反动派，保卫革命果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祖国繁荣和富强就关系到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关系到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这是各民族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离开了这个根本利益来孤立地考虑某一民族的利益，那就是民族的利己主义，也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在我国，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应在各民族地区大大加强。因为今天我们还是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对我国尤其是我国边疆进行破坏活动，西藏事件就是帝国主义与反动上层互相勾结进行叛乱的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所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乃是各族人民一个共同的首要任务。而且我国在物力资源与人力资源上，各民族地区都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地区都缺少独立自主的条件。如汉族地区虽然文化技术程度较高，但人多地少，资源不足；边疆地区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文化技术程度比较落后；因此互相协作，统一安排计划就会使国家建设和地方建设（包括民族地区）都飞跃前进，反之，就会使大家都蒙受损失。所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各民族的利益，各族人民都必须要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加强团结，加强合作。这就是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

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①

但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是建築在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的，即把國家利益與世界無產階級的整体利益結合起來。因此，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时必須加強國際主義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使人們認識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一致性。一國或一個民族的無產階級不僅要求自己從本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同時還要支援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無產階級獲得解放。今天全世界還有一半以上的勞動人民還沒有擺脫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而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又無時無刻不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這就要求國際工人階級，特別是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要加強國際團結，加強對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大團結，這樣才能挫敗帝國主義的陰謀，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徹底勝利。

我們必須認識到：加強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勝利的果實，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為了使各民族融合為一個整体創造條件。故無產階級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假如把這兩者對立起來，那就會陷於現代修正主義的窠臼，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做法了。共產黨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右翼社會黨人的地方，就在於：“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他們始終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②

此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必須廣泛地進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教育，通過這一教育，使人們的眼界不會只看到自己面前的小天地，而是具有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認識到那種整天在個人問題上打轉，一切從

個人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渺小和可鄙；認識到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它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整体利益的危害作用；認識到個人利益，局部利益同偉大的共產主義的利益比較起來，只是大樹上的一枝一葉，在任何時候都只能處於從屬的地位，而不應加以強調。

這種教育不僅對於培養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人是重要的，同樣對於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加強各个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協作也有頭等的重要意義。

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關係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種嶄新的關係，這是在剝削制度廢除以後必然出現的新事物。然而新社會是從舊社會的母胎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社會主義的階段上不可避免還存在許多舊社會的痕跡，特別是意識形態這個東西，當舊的生產關係改變很久以後還會在人們的頭腦中保留它的殘余。這些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如不及時加以克服，就會影響新的生產關係的鞏固。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多民族國家中的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故為了鞏固新的民族關係，社會主義國家不單要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堅決貫徹馬列主義的民族政策，而且必須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的殘余不斷進行鬥爭，並經常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來教育幹部和群眾，這樣才能使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得到鞏固和進一步的發展。

1959年6月19日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1頁。

② 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初稿”。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793頁。

对工农群众理论学习方法问题的看法

中共广州益丰搪瓷厂
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朱济灵

发表在“理论与实践”今年第五期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学习原则”一文，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和“从实际出发学理论”以及系统的基本理论学习“做什么，学什么”之间的关系，这是有意义的。但作者梁克同志过于强调了理论学习的计划性、系统性，而对于先摆问题，鸣放辩论，抓住矛盾，再阅读文件书籍，然后以书本中的原理分析问题的学习方法，未免有些片面，她断言在基础理论学习中，系统地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的方法应该是主要的。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梁克同志认为在工农还未感到迫切需要理论学习和对理论学习还未发生兴趣的情况下，为了引导和掀起工农学理论的热潮，才有必要采取先摆工作或生产中的情况，鸣放，再读书本，然后展开争辩的办法进行学习。反过来说，当工农对学理论发生了兴趣之后，这种方法就不适合了，而应该用系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的方法来代替。在我看来，从当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选择对解决这些问题最密切相关的理论来学习，并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方法，不但在工农对理论学习还未发生兴趣之前适用，而且在工农对理论学习发生兴趣之后在基础理论学习中，也是适用的。因为继续采取这种方法可以把工农学理论的热情继续巩固和提高；并且也只有采取这种学习方法，才能使理论学习更好地为当前的工作、生产和其他实践的需要服务，真正起到学以致用和立竿见影的作用。而这点正是符合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

梁克同志说：“做什么，学什么”的学

习方法，一般地说，比较适合领导干部和从事理论研究或已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人。”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做什么，学什么，即当前工作、生产和学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选择对解决这些问题最密切相关的理论原理来学习，比较适合工农群众与一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人。因为这个问题是长远需要与当前需要的问题，对一个未学过基础理论的人来说，当然需要把一切的基础理论都学懂，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按系统、按部就班地学习理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学到了一些理论原则，目前用不着，将来才用得着；而那些目前迫切需要运用来解决当前工作、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原则，却不一定学到。既然理论学习是为了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实践，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顾实际需要，偏要按照一个脱离实际的系统、按计划来学习，而不首先学习那些对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原则呢？况且，从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有关的理论问题，并不排斥打好理论基础的长远需要，因为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学习理论，将会随着客观需要的不断变化发展，从学习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到另一些理论问题，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大体上把全部基础理论学习完毕，到那时再回过头来把学过的理论问题，从头到尾来一次总复习，这样，不是同样可以获得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吗？

梁克同志提出：“如果不首先弄清楚所要学的理论内容究竟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试问根据什么来摆情况，开展鸣放辩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未弄清所要学的理论内容是什么，要解决些什么问题之前，同样可以先摆情况，开展鸣放辩论。因为先摆情况，开展鸣放辩论目的在于抓生产、工作与思想中的主要问题，然后根据这些主要问题来确定学习内容，这可能要比先用理论去套实际要好一些。例如我厂第一个工人哲学小组进行第一次学习时，领导上最初只决定学“矛盾论”，但先学什么内容心中还没有数，于是我们便发动大家鸣放，讨论“生产任务没有完成，产品质量不好，究竟是什么原因？”的问题。鸣放结果，发现学员强调客观困难的多，检查主观努力不够的少，因而我们便决定学习内因与外因对事物发展的关系。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结果不但学好了理论，而且也解决了“唯条件论”和右倾保守和埋怨领导的不正确思想，使生产得到迅速提高。当然，从实际出发学理论，也不一定都要先鸣放辩论。如果领导心中有数，知道当前职工思想、生产存在着什么主要问题，也可以根据这些主要问题来确定学习内容，学了理论后，再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是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的。

梁克同志还谈到：“党在战争期间，用这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的方法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这已为历史经验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容推翻的。”我认为在讨论工农学理论的方法的时候，引证这样的历史经验是不很恰当的，别忘记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要作具体分析，在那时学理论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干部，而现在我们谈的是工农学理论的方法问题，如不分别对待很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以上我所谈的，只是想说明从当前需要出发学理论的优点，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十全十美，没有任何局限性了。由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理论问题，毕竟还是有限的，特别为了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才去学理论，这样获得的理论知识将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那种认为既然提倡做什么、学什么的学习方法，系统地学习理论就不必要了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对于工农群众来说，过于强调系统和按部就班进行学习，在一定的条件下，不但不容易掀起和巩固工农学理论的热情，而且在时间上也难于解决理论学习和生产、工作与其他学习的矛盾，这样就难于把理论学习坚持下来。因此，正确的理论学习的方法是：把从实际出发学理论和系统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并且在两者的结合中，分清主次。对当前工农学理论来说，从实际出发学理论，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应该说是主要的学习方法，至于如何把这种学习方法，同系统的学习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还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学习的实践中去解决。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确实需要多读点书。但是，读书要有正确的方法；不然，钻进书堆去，爬不出来，那是不妙的。梁克同志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探讨这个方法，其用意是好的。梁光同志在“理论与实践”今年第五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则”，但在她的论述中却违背了这个原则，在实质上否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针。这样说，是不是把问题说得严重了呢？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所以梁克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以什么为中心，从哪里出发？

曾树材

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则”，但在她的论述中却违背了这个原则，在实质上否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针。这样说，是不是把问题说得严重了呢？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所以梁克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为什么說梁文带有根本性质的錯誤呢？这里先引出梁克同志的一段話来研究：“……把局部的經驗夸大為全部的經驗，把个别的学习形式代替一般的理論学习形式，这就会无形中否定了理論学习的計劃性、系統性，否定了‘先精通而后运用’的理論学习原則，……馬列主义基本理論学习，毕竟和业务或政策方针的学习有所区别……一般的业务学习，是根据工作或生产中存在的問題，展开討論，然后再找理論根据，这是为了直接解决工作和生产問題而联系理論，是以业务为中心，以理論为指导，并非以理論学习为中心，联系实际。”

其中所謂“先精通而后运用的理論学习原則”，与党的“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这是人們早已批判过的所謂“联系实际的阶段論”。这段話的内容实际上提出：理論学习应以什么为中心，也就是說理論学习应该从哪里出发的問題。梁克同志認為应该以理論为中心，联系实际。这个主张，同党的观点确是針鋒相对的。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一文中，教导我們“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則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主席这段話指出了理論工作的根本問題，非常明确地、正确地规定了理論工作的方向。以研究革命中的实际問題为中心和以研究理論为中心，显然是二条不同的对立的方针：一条是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另一条是从书本出发的方针。为什么我們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研究实际問題为中心呢？这个道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早就反复說过了的：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梁克同志虽然也說到要“从实际出发学理論”，然而从他的論述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却不是这样的。“业务学习以业务为中心，理論学习以理論为中心”，只能得出“从书本出发”的結論。正因为梁克同志

在这个根本問題上存在錯誤的看法，所以在其他問題的看法上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例如，对去年工农群众学哲学的看法問題。梁克同志認為“先摆問題，鳴放、辯論、抓住矛盾，再閱讀文件、书籍，然后再展开爭辯的方法”，“显然是从形式”来看“从实际出发”学理論。試問：这样做，是不是仅仅“形式”問題呢？不是的。这是严肃認真地貫徹了“从实际出发”、“以研究实际問題为中心”的方法問題，是唯物主义的方法，群众路綫的方法。党去年运用这个方法組織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矛盾論”等哲学著作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群众反映說：这下子就能学懂理論了。为什么工农群众如此欢迎这种学理論的方法呢？这就是工农群众“为了找办法解决生产上的問題，这就是从生产实际出发，經過学习理論，解放思想，然后又回到生产中去，发展生产。这是学习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康生語）这个方法是經過实践檢驗过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完美无缺的。如何繼續运用这个方法，正有待从事理論工作的同志总结經驗，提高一步。梁克同志文章的开头提出：“目前的問題是：如何使工农学理論在普及的基础上繼續提高”。这个建議是好的。但是，当梁克同志在探討这个問題时，显然低估了去年工农学理論的成績和意义；把这样一个学习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看成仅仅是形式問題。

关于“做什么，学什么”与系統学习理論的关系問題。我認為，假如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研究实际問題为中心的方针，那么，这二者之間的关系是統一的。这首先要正确理解“做什么，学什么”的涵义。梁克同志認為“做什么，学什么”是指业务而言。这一点“理論与实践”第六期房松、郑凌华的文章也肯定这一点，并引証一九四二年中共中

央政治局的决定加以說明。但是我認为这个口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同样适用于理論学习。所謂“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只要坚持貫徹理論学习必須从实际出发、以研究实际問題为中心的方針；而不要把它了解为“零敲碎打”、“就事論事”的学习方法。事实上，这口号是就实論虛、以虛帶实，边干边学，边学边用的通俗化、概括性的提法。可见，这个方法也就是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的方法，今年工人根据整頓生产秩序学习政治經濟学常識和机关干部学习政治經濟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做法，也可以叫做“做什么，学什么”的方法。这个方法既适用于工农群众，也适用于干部或专搞理論工作的人。但是，梁克同志在这一点上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梁文的前头說，这方法“可以适用于：在工农还未

感觉到迫切需要理論学习和对理論学习还未发生兴趣的情况”（见“理論与实践”第五期第16頁），后面又說：这方法，“一般地說，比較适合领导干部和从事理論研究工作或已具有馬列主义理論水平的人。”（同上书，第17頁）当然，我們也不能把这一方法当作理論学习唯一正确的方法。系統的基础理論的学习还是必要的，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毕竟是一門体系严整的科学，这样就要求人們要有步驟地、有計劃地、有恒心地去学习，脚踏实地，由浅入深，循序漸进。問題在于：系統的基础理論的学习，还是必須首先解决一个出发点問題，即到底以研究实际問題为中心、从实际出发呢，还是以理論为中心、从书本出发。毫無疑問，應該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先精通然后才能运用嗎？

王 琴

理論联系实际，是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的基本原則，也是为克服理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所提出来的学习原則。我們在学习中必須要坚持这个原則。可是，有些人对这一原則的理解，却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如今年“理論与实践”第五期“坚持‘理論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則”一文中的某些論点就值得研究，作者梁克同志說：“学习馬列主义理論必需認真讀書，要通过粗讀、細讀、精讀的各个阶段，要反复多次，直至弄通理論的精神和實質，然后再运用于实际，以之分析解决实际問題。”在多一个地方作者又說：“要先精通而后运用”。我認为，学习馬列主义理論，要求精通，也要求运用，这是无可非議的，但是如果把“精通”和“运用”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認为要“先精通然后运用”，并把它当作一个“理論学习的原則”，这就不能說是正确的了。

誰都不能否認，我們学习理論的目的，从来就是为了解决实际問題的，越是精通馬列主义理論的人，就越能以理論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問題。但是怎样才能精通呢？是否一定要象梁克同志所說的那樣，先精通然后才能运用于实际呢？要是按照梁克同志的主张去学习理論，自然就会把学到一大堆理論概念、公式或空洞的条文，看作是“精通”理論了。这其实是把理論和实际、学和用分割开来。离开实际，离开当前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孤立地去进行理論的学习和研究，这种为理論而理論的作法，不仅永远不能領会馬列主义的精神實質，永远达不到真正精通理論，而且学来的东西，决不能解决实际問題，决不能指导革命工作的实践。

不錯，要精通理論，学习书本知識是很重要的，但是决不能离开实践离开实际去学习理論。馬列主义的認識論教导我們，理論知

識主要是来源于变革现实的实践，毛主席說：“認識从实践开始，經過实践得到了理論知識，”又說：“离开实践認識是不可能的。”（“实践論”）所以要掌握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要精通理論，决不能离开实践，离开运用；只有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学习，边学边用，才有可能达到精通理論。一般說来，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并不是人人都先学好了理論，精通了馬列主义理論，才运用它来变革现实，恰恰相反，人們是在从事变革现实的实践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認識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認識真理，掌握真理的。

人們对于客观事物、对于真理的認識，是由浅入深，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毛主席在“实践論”中把認識过程分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两个阶段。感性認識是認識过程的第一步，它是对外界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及其外部联系的接触，这是属于感觉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完全可靠，才能正确認識客观事物。理性認識是将感觉的材料，实行分析与綜合，抽象与概括，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認識的統一过程，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它們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認識阶段，更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沟。“理性認識依赖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如果把两个阶段机械地分离开来，或者只重理性認識而忽視或輕視感性認識，或只重感性認識而忽視或輕視理性認識，都是违反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

感性認識固然离不开实践，理性認識也离不开实践。毛主席在談到理論对实践的依賴关系时指出：“理論的基础是实践，又轉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結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辯証唯物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論）所以从实践获

得的理論，还須回到实践去用以指导实践，同时也只有經過实践才能檢驗理論与发展理論。毛主席把認識过程中实践与理論辯証地統一起来，得出“理論与实践統一”的結論，并把它规定为学习馬列主义理論的基本原则。

当然，理論学习是一种包含着接受間接实践，或者說經過了总结的实践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脱离直接的实践。所以，真正贯彻和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須是从实际出发，把学习和运用結合起来，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方法，并不断地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問題。那种脱离实际、孤立地研究理論，把学和用分割开来，強調“先精通然后运用”的主张，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必須坚决反对。

最近中共广东省委为了提高全体干部的理論小平和工作能力，开展学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运动，省委宣传部在关于这次学习的意见中指出：“围绕当前的重大实际問題，組織干部認真学习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针对干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存在的問題，深入进行唯物論的認識論、唯物辯証法和群众路綫的教育，以提高各級干部的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适应当前的政治情况与实际工作的需要”。无疑的，这一次学习运动，就是以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理論联系实际，研究当前社会經济生活实际与工农业生产实际所发生的問題，并运用理論来解决它，繼續巩固去年大跃进的成果和爭取今年工农业生产的繼續大跃进。因此我們这次的学习运动，既是馬列主义理論学习，又是党的方針政策的学习，既是解决理論、思想認識中的問題，也要解决实际工作的問題。这說明必須坚持理論和实际密切結合的正确方針，反对理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才能使我們的学习达到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方法，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

略論中国农民战争历史的发展規律

唐陶华

毛主席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因此，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規律性加以研究，不特有助于闡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規律，而且可以丰富世界史的内容，意义是很重大的。

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地主阶级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統治，这是毛主席指出有关中国农民战争的第一条規律。这些农民战争大抵可以隋朝的統一为界綫分为前后两期。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因而农民战争在前期和后期各有显著的特点。

前期封建社会还在向上发展阶段，奴隶制的残余长期存在。封建地主利用經濟地位和政治势力来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轉化为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奴隶。因此，反兼并反依附化和反奴隶化是这一时期农民战争的斗争綱領和实际要求，但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还属于初級形态，对于这些实际要求还不能够具体而明确地提出来。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开始破坏，土地逐漸轉化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这时，很多貴族奴隶主因丧失控制土地的权力而沒落了，但也有些貴族和一些富有的农民因兼并了破产农民的土地而轉化为新兴的地主。那些破产的农民

或則轉化为地主的依附农民，或則轉化为奴隶。这种情形，到了秦帝国时尤为厉害。秦末农民战争的領袖陈胜出身“庸耕”，是給地主耕田的雇农。陈胜起义軍中有呂臣率領的蒼头軍。这些义軍都有很多刑徒参加，显然带有奴隶起义的浓厚意义。从它的起因看来，它是为了反抗秦代过重的徭役負担，也足以說明它的反兼并反依附化和反奴隶化的要求是非常明显的。

刘邦进入关中时，提出的口号是“杀人者死”，他做了皇帝后，号召在战争期間逃亡的人返回本乡，追回他們原有的田宅；同时下令兵士复員回家生产，并且尽先給他們土地，軍官依照軍功大小，分給田宅，这是滿足农民反兼并、反依附化的要求。战争期間卖身做奴隶的，都解放做平民，这是滿足他們反奴隶化的要求。从新王朝統治者的詿步措施来看，秦末农民战争的实际要求是反兼并反依附化和反奴隶化也是很明显的。

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的趋势又有了发展。兼并农民土地的豪强：有些是富商大賈，从汉昭帝到汉平帝的八十年間，出现了财产以千万計甚至以万万計的大商人，他們大量的兼并关中的土地。有些則是貴族和大官僚，例如貴族王立在南郡强占草田几百頃，又如大官僚张禹在涇渭流域买腴田多到四百頃，也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变为大地主的依附农民，有的則变为奴婢。汉元帝时貢禹說，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可见当

时奴婢数量的众多。由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轉化为奴隶，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王莽曾頒布一些法令，企图制止土地兼并，緩和阶级矛盾，沒有成功，农民实行起义。各方起义軍的参加者大都是被暴政逼迫，无法生活的广大农民，所以反兼并反依附化是他們实际要求的内容。汉成帝时，潁川郡鉄官徒、广汉郡死罪囚、山阳郡鉄官徒等先后起义，这些罪徒都是国家的奴隶，他們的起义說明农民反奴隶化的实际要求。赤眉軍起义时，約定“杀人者死”，这也反映了反奴隶化的实际内容。所以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也是农民反兼并反依附化反奴隶化的斗争。这种要求还可以从东汉的設施上看到，如：东汉初年，鼓励缺少田地的农民去垦荒，免除他們三年算賦。从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先后下了九道解放奴隶和禁止残害奴隶的命令，就是滿足这一要求的表现。

由豪强地主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曾經下令检查垦田与戶口实数。但州郡官对霸占大量土地的豪强，不敢查問，而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則大肆詭詐。到了东汉后期，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疯狂地霸占农民的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部分轉化为依附农民和奴隶，另一部分則变为无衣无食的流民。依附农民叫做“客作”、“徒附”或“部曲”，对豪强地主依附的程度，較前又进了一步。他們被豪强地主組織起来，建立了塢壁，每年秋天教練战射，成为割据称雄的武力。这些，都是东汉政权被豪强地主操纵所得来的結果。

黄巾軍的基础起初是大量穷苦农民和流民，后来加入在塢壁里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奴隶，他們扶老携幼全家从軍，队伍非常庞大。张角兄弟三人宣传的宗教“太平道”，有許多反对奴隶制的戒条。所以这次农民战争的实际要求也是反兼并反依附化和反奴隶化。曹操收編黄巾軍以后，实行屯田制，这也是滿足农民反兼并反依附化的要求。

北魏統治阶级崇信佛教，大举修建佛寺，致寺院大量侵占农民的田宅，例如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頃，还有种梨棗等树的大果园。那时的僧祇戶(蔭戶)、佛图戶，就是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的奴隶；寺院又經營高利貸，收买那些还不起貸款的农民为奴隶。此外，世俗的宗主也进行土地兼并，破坏均田制。可以說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实际要求也是反兼并反依附化和反奴隶化。北周武帝时，废灭佛教，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奴婢得到释放。那时上距各族人民大起义虽已有四五十年，但仍是滿足农民长期以来反奴隶化的要求。

地主阶级是封建統治的基础，但中央政权和大地主間也有一定的矛盾。因为中央政权要向农民征賦稅和征发徭役，而大地主則把許多自耕农民变成自己的依附农民，这样就影响到国家的租賦收入和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因此，在农民对大地主进行反兼并、反依附化的斗争过程中，中央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农民，設法滿足农民的要求，使农民直接归国家控制，以削弱大地主的势力，特别是在农民战争結束以后，这种情形尤为显著。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农民反依附化的主要对象是大地主，而不是国家。又因为中央政权对农民的剝削輕一些，农民对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滿意，所以陈胜、吳广起义时，冒用公子扶苏的名义，号召人民反秦，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軍拥护刘玄和刘盆子做皇帝，这都是农民不反对中央政权的明証。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疯狂掠夺农民土地的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非常密切，农民才提出了“蒼天当死”的推翻东汉政权的口号。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封建大地主用兼并土地把农民变为依附农民和奴隶的办法来残酷地剝削农民，因而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是反兼并、反

依附化和反奴隶化的战争。农民反依附化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大地主，而不是国家。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趋势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奴隶制的残余则已经大大地削弱或者消灭。唐朝中叶以后，出现了为地主耕种土地的佃户，佃户较依附农民较有人身自由，可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

自唐朝中叶均田制破坏以后，中央政权与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这就是国家放弃了对土地和农民的直接控制，不再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承认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来向地主收税，但由于国家收取的赋税较重，大地主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因而土地集中的情况便随着严重起来。所以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是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和要求平分土地的战争。

隋末的农民战争，是由于无止境的徭役迫使千千万万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和征募农民进行侵略高丽的战争而爆发起来的。这次农民战争的实际斗争纲领是反徭役，反对“扫地为兵”，这时均田制还没有彻底破坏，所以这次农民战争不象后来的那样具有平分土地的要求。唐朝中叶以后，官僚、地主不遵守两税法的规定，不按照贫富的等第纳税。他们逃避租税，并且隐匿许多庄户也不纳税。政府就把一个地方的定额租税均摊在自耕农的身上。贫苦农民纳不起税，就只得逃亡和起义了。王仙芝起义军发布文告，痛斥唐朝政府官吏的贪污和租税的苛重，这可以说明这次农民战争的实际要求是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也说明这次农民战争具有平分土地的要求。

从宋太宗到宋神宗这一期间，土地逐渐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统治集团里的苏洵、李觏等人提出“限田”、“井田”等主张，也正反映出土地问题的严重。北宋有许多地主、官僚享有免税特权，又有许多大地主隐

瞒土地，逃避租税，结果，自耕农就负担沉重的租税而日趋破产了。北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军继续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北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指斥北宋政府“赋役繁重、官吏侵渔”。这一切都可以说明宋朝的农民战争的实际斗争纲领，是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要求平分土地。

元朝建立时，不象其他朝代开始那样，对农民没有让步的措施，因此元朝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元朝的租税又非常繁重，同时残酷的劳役使农民死伤很多。所以元末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封建国家剥削的性质。

明朝后期，按田亩加派“辽餉”，后来又加派杂项，所以农民的租赋负担非常沉重，因而爆发了起义。明政府为了镇压农民军，又增加了“剿餉”和“练餉”。这两项和辽餉合计起来，多到每年1,670多万两。从而农民起义越发增多。所以这次农民战争的实际斗争纲领是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明朝中期以后，土地集中也达到惊人的程度。皇族、外戚、宦官和皇帝自己都疯狂地掠夺人民的土地，建立起庄田和皇庄。1393年，明政府统计全国的田有8,507,623顷，到1502年，只剩下4,228,058顷，足足减少了一半。这就是统治集团霸占民田为庄田的结果。所以这次农民战争的实际斗争纲领有要求平分土地的内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均田”“免赋”的斗争纲领是具有这样的斗争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封建国家的赋税繁多，农民的负担的沉重，所以农民战争的斗争纲领是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又由于贵族、官僚、地主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农民战争的斗争纲领又有平分土地的要求。与前期比较起来，农民的斗争由反兼并反依附化进而要求平分土地，由拥

护好皇帝进而反对封建国家的剥削，这是极大的进步。

二

毛主席說：“……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第二条规律。

中国的农民战争为什么总是失败？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和方案。又由于当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农民战争的结果只有两种：第一，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下去；第二，农民出身的人做了皇帝，按照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来统治农民。

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没有建设新社会的理想。所以农民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的特点，因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农民的耕地是分散的而且在无止境地零碎化。农民战争的这些特点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适合。

自发性、分散性、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但是前期和后期比较起来，这些特点在程度上不相同。就前期的农民战争来说，自发性 and 分散性较强，提出的口号比较模糊，没有充分反映农民的实际要求；就后期的农民战争来说，组织性和觉悟性较强，提出的口号比较明确，比较能够反映出农民的实际要求。

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战争由于组织性不强，领导不统一，所以领导权有时为混入起义军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所篡夺。例如绿林军内部由于地主阶级分子的破坏，发生了分裂。这样，起义军就给地主阶级分子所利用而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了。

封建社会后期的历次农民战争，除了隋末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性的战争以外，其余各次或则是经过领导者长期的组织发动起来的，或则是起义后迅速加强组织和领导的。经过起义的领导人长期的努力而组织起来的农民战争，如北宋王小波领导的起义，南宋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等都是这样。

农民战争所以总是失败，和农民战争的战略特点也有关系。农民战争的战略特点是流动作战而不建立根据地。这是破产农民到处流亡的生活状况的反映。

这个流动作战而不建立根据地的特点是农民战争的优点，也是农民战争的弱点。从优点方面来说，“流动作战”就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进攻，“不建立根据地”则可以集中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发展比较迅速。从弱点方面来说，就是主力军集中在一处，遭受了一次比较大的挫折以后，不容易恢复实力；又因为没有后方根据地，兵源的补充有困难，结果，起义军往往迅速衰落下去。

从历史事实来看，不论秦末，西汉末，或者东汉末的农民战争，都没有建立根据地。刘邦起初也不注意建立根据地，只是后来到了与项羽争夺帝位时，才决定以关中作为根据地，但那时已经失去了农民战争的性质，而是争夺帝位的战争了。

到了后期，情形就不同了。在战略上有三种情况：第一，完全流动作战，例如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就是。黄巢起义军在起义后的五六年之内，运用流动作战的方式，几乎走遍了全国。但是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以致起义军在长安被包围时，粮食得不到接济，而不得不退出。起义军退出了长安以后，也没有根据地可去。第二，注意根据地的建立，例如北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和南宋杨么领导的起义军就是。他们都先行建立根据地，把斗争纲领在根据地尽力施行。这样做的缺点是势力的发展比较缓慢，加以缺乏

斗争經驗，以致在势力还没有得到发展，就被統治阶级所扑灭。但建立根据地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当方腊被俘后，余众七万人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坚持战斗，結果全部牺牲。第三，以流动作战为主，同时注意根据地的建立，例如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軍就是这样，流动作战了十几年以后，才听从顧君恩的建議，先占关中作根据地，然后进兵北京。但他对于根据地只是派兵駐守，没有在根据地內贯彻执行自己提出过的斗争綱領，爭取根据地群众的支持。所以他从北京退出后，这个关中根据地沒有發揮出应有的作用。

在建立根据地的問題上，后期的农民战争显然較前期进了一步。这是中国农民从历次农民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經驗。

三

毛泽东同志說：“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第三条規律。

中国的农民战争既然总是失敗，被地主阶级利用了去，当作改朝換代的工具，为什么它又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因为农民固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但农民是劳动人民，是生产的主力軍。农民在主观上虽不能提出建設新社会的理想，但劳动人民到底是历史的主人，农民战争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所发生的推动

作用，前期和后期是不相同的。

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还在上升的阶段，农民战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基本上消灭了奴隶制的残余。由于秦末和西汉末的农民战争，汉高祖和汉光武都曾先后下令解放奴隶。到隋朝实行均田制时，取消奴婢可以受田的规定。于是奴隶制的残余基本上消灭了。第二，大大地削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历次的农民战争，农民从受大地主的控制轉到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第三，迫使統治者做出一些让步。农民战争虽則总是失敗，給地主阶级利用为改朝換代的工具，但新王朝的統治者总要做出一一些让步，如減輕賦稅，奖励开荒等，使生产力有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內部的工商业已逐渐发展，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具体表现在：第一，解放了劳动力为工商业的生产准备了劳动力的条件。农民摆脱了对大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后，唐朝中叶以后轉化为佃戶，比較有人身自由，因而为工商业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第二，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为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由于农民战争的結果，迫使統治者让步，生产得到恢复，人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这就为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第三，打击了封建統治者对工商的垄断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唐朝的王仙芝和黄巢都是私盐販出身，他們的起义含有反对政府食盐专卖政策的意义。北宋王小波、李順以販茶为业，他們的起义与反对政府“禁止私市”有关，也就是反对政府茶叶专卖的政策。明朝刘通、李原的起义主要是反对明政府“禁山”，都有这样的意义。

自我批判和答辯

刘 节

“理論与实践”一九五八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九年第二期登載了关于批判我的文章共有三篇，我很感謝批判者对我的帮助。通过批評，使我認識到我思想中那些有害成份，應該提高警惕，加以鏟除；同时觉得有一些合理的成份，也需要坚持下去。究竟那些有害，那些合理，希望大家来討論。

一、“两种法則的批判”

我主张人类社会流行着“两种法則”，我以前名之为“历史上两种法則”。是不是人类历史中流行着我所說的“两种法則”呢？历史的趋向是不是向着这“两种法則”的“統一”方面走去呢？这應該是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中心問題。所謂“两种法則”：一种是“自然法則”，另一种是“人为法則”，而人类的文化正是趋向于这两种法則的“統一”。換一种說法，也就是“我的初現”，与“我的真正实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据我过去的看法，整部中国思想史是貫串了这一中心問題的。就是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貫串于其間。他們对于人类历史的認識，是一部“天理”与“人欲”如何“統一”的問題。事实上就是“自然法則”与“人为法則”應該“統一”的問題，与如何“統一”的問題的思想貫串于其間。

“自然法則”当然是有的，因为我們人类的一切行动，首先是受“自然法則”所支配的。同样的，人类的早期社会也是受着“自然法則”所支配的，这就是在沒有階級的原始社会里还没有出現“人为法則”。到了階級社会出現以后，“人为法則”就抬头

了，这是跟着“我”的发现而相应出現的。从此，人类社会就慢慢地跟着“人为法則”走；同时，“人为法則”也慢慢地越与“自然法則”相违背了。“我”的成份不合理地扩张起来影响了“群”的利益。我曾經对此有过这样的解释：“这里面不外‘自然法則’同‘人为法則’的冲突及‘人为法則’同‘人为法則’的冲突。一部人类史就在这样矛盾中消逝了。”其实这种思想是因袭老子：“天之道損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来的，只是我把“天之道”算作“自然法則”，“人之道”算作“人为法則”；又夾杂进一些宋儒客观唯心論一派的思想，把“理性”說作“自然法則”，以为仁义礼知是先天具足的“自然法則”；又把“欲望”說作是“人为法則”的中心，把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說法也結合进去，說：“人之道是反自然的，也可以說是反理性的。”現在我認識到这一系列的推論，实在有許多毛病。因为把“自然法則”很簡單地說作是合于“理性”的，那末“兽禽食人”也是合于“理性”的行为了！“物竞天择”也是“損有余以补不足”的“理性”行为嗎？这岂不是“弱肉强食”也是合于“理性”的了！据我现在的看法，采用了老子的思想，似乎与階級立场没有什么矛盾。显然这样提出問題是很难講得好的，而且也結合得有点不伦不类。

至于我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和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董仲舒所說的“天人合一”有所不同的，他是想把“自然法則”合到他所謂“人为法則”中去，才会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講法。我是承認人类社会在变的，历史上一切事实是接着两种法則的矛盾

冲突来变的，要变出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来。这是我所謂“天人合一”的基本内容。照我的說法，这两种法則的統一就是“情”与“理”的統一，这个“理”是“先天具足”的“理”，所以說是客观唯心論，并不是唯物論。但是有人就此推論出我有“法西斯”思想，則未免有点“危言聳听”。我說“天人合一”就是“社会理性”的实现，也就是社会組織的合理化。虽然沒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讲得好，似乎也不至有什么很大的抵触。只能說：我这种說法太籠統，不具体，不能解决实际問題。不能說历史上并无两种法則的冲突与矛盾。我自己还認為我这种思想是有意无意間接受了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比之我接受費希忒的国家观念，在我的思想中應該是更加重要的一部分。我是認為人类社会在发展的，人类的思想感情也在发展的，即所謂“天地未济，人类无我”。而从“我的初現”到“我的真正实现”，正是要我們在社会改造过程中解决“自私”的問題，否則为什么这样強調“我”呢？如果抓住“階級性”來說明“人性”，也是从现实事件中向前深入一步，来就近解决“自私”这一問題，也未始不是一种分析事物的方法。这大概是我对于客观唯心論之自我欣賞的重要根源之一吧。

二、对于客观唯心主义之自我欣賞的批判

我曾經公开說过：我到现在还是唯心主义者。当时，意思是說：你們讲辯証唯物主义的人不是也有变成右派分子的嗎？这虽然是一九五七年暑假前的思想情况，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錯誤，就是把讲辯証唯物論的人与辯証唯物論本身等同起来看待。在这种思想的夾縫里我認為唯心論者是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而且只有讲唯心論的人才有可能做“好人”。把“好人”一观念与立场、观点、方法分开来看，这是我最大的錯誤。我的“好人观”是超階級的，我

所謂“好人”的标准，无非出于儒家哲学或客观唯心主义——康德的哲学。因此我必須把胸中橫梗着的东西搞个清楚。否則这种唯心主义的自我欣賞是永远消除不掉的。

首先談談先改造人然后能改造社会的問題。从前我曾这样說过：“我們的理想，應該是从改良人性到改良社会；然后我們的行动，可以从改良社会到改良人性。”照现在看来，說法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事业，革命事业，决不是几个所謂“好人”所能解决得了的。这是大众的事，必須由大众来解决；决不是由几个人所能包办代替。其次，我所謂“好人”，其标准既然不正确，甚至可能是坏人；那末把社会上的重要事业交給几个所謂“好人”来做，其結果岂不是适得其反嗎？其实，好人与坏人的分別應該以其階級立场做分界綫。

三、对主观主义教学方法的批判

所謂主观主义的教学方法在我的教課里所表现出来的有下列几件事。在这些事例里，可以看出我对于客观唯心論的爱好。首先就是在“史学史”的叙論里采用了我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历史論”中的講法，稍微改头換面一下，就在“史学史”的叙論里摆出来。这里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懶，其实我还可以用一些比較新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的，不一定非采用旧說不可。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历史論”一书中所持的論点，还有恋恋不舍之意，觉得这种說法还有一点理由，可以再搬出来。沒有仔細地研究历史唯物論，就很牽强地用陈旧的观点，附会上一些比較新的詞句加以裝飾起来充数。致发生不良的效果，这是很不对的。

检查起来，我在“史学史”的叙論里既然承認易传哲学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但是所举出来的例証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段話。可见我的着重点是很主观的，不很得当的。其实，用易传

的“哀多益寡，称物平施”；老子的“天之道損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等話，說明古代的哲学家已看到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要求有所改革，岂不是就能接近于现在人的口味了嗎？就因为我很重視个人的行为，认为个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历史事件；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仍旧是受“改造了人，才能改造社会”这一观点所影响。

在史学史“王船山史論”那一章里，很強調王船山善于处乱世，并且歌頌他能在乱世里順利通过。最后一段，又引了讀通鑑論卷一的“孔鮒藏书，陈余危之！鮒曰：‘吾为无用之学，知我者为友。秦非吾友，我何危哉？’王船山对这件事就評論說：‘嗚呼！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讀通鑑論中可談的問題很多，何必把这件事拿出来講呢？真是“厚古薄今”到了极点。

至于我把中国史学史中分出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魏晋南北朝，第二次高潮是两宋，第三次高潮是清代），有人不同意我的分法，这是值得討論的。其中有两次高潮，照我的說法都是因为考据学的高漲而得名。两宋与清代的史学本不相同，而且宋人很重視当代史的研究。如李攸、王偁、徐梦莘、李燾、李心传諸人的著作都是分量相当多，而质量也相当高的，他們可以說是当代史专家。此外如刘恕、苏轍、罗泌、胡宏、金履祥等的古史著作也很有份量，传誦一时。为什么这样重視黃震、王应麟这两个人呢？就因为我很重視考据学，所以特別推崇他两个人的著作，因而把宋代的史学也算作高潮了。总之“史学史”的組織方法与基本内容待修改的地方是很多的，但应该如何修改，还要仔細加以考虑。

四、对我的学术路綫的分析与批判

我研究学問的路綫一向是走资产阶级的

白专道路，为兴趣而研究学問。因此有人說我引誘学生钻故紙堆，脱离政治。我以前听了这番話之后，真是又生气！又好笑！现在看起来也真有点道理，因为客观的效果是如此，虽然我沒有存心想引誘什么人。我以前脱离政治是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倒无可厚非；现在，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不应该的了。但我自己还认为我一向习惯如此，从来不愿意在惊涛駭浪中混水摸魚。我沒有認識到现在再来宣传脱离政治，就会变成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不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的危害性之大，非同往日可比。

关于研究学問的方法問題，我认为考证和疑古仍然需要。当然，象胡适他們那样怀疑古史，是不科学的。例如他們最初怀疑夏禹并无其人，到了抗战期中，竟为水利工程学会找出禹的生日为水利工程的节日。这样自相矛盾，是可笑的。由此可知他們之怀疑夏禹，并不是在做科学研究，而是在譁众取宠；批判这样的“科学精神”，我认为应该是的。甚至可以这样說，批判了这种矛盾，才能把疑古精神更科学地建立起来。怀疑古史传说，是不是就算是对中国古史的虛无主义呢？我认为，对于古史传说的怀疑，应该說是从先秦以来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孟子早就說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王充、刘知几都是史学史上疑古派的重要代表；就連那位与封建統治最有血肉关联的司馬光，也曾經作过“史劄”一书。照道理說：三皇、五帝的传说，决不是古代劳动人民所創造出来的，原是古代統治阶级所杜撰出来的偶像。凡是偶像，显然都是为古代的統治阶级服务的，古代的劳动人民是不需要偶像的。即使我在“史学史”讲稿中鼓吹了疑古精神，也不一定就是想为古史辨派找市场，疑古精神是不能給古史辨派专利起来的。

我們要打倒古史上的偶像，以真事实給中国古代史奠定一个科学的基础。这项工作，无疑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現在的問題就在于古史辨派在當時是否有反傳統與打倒統治階級的偶像的決心。即使他們在當時曾經想到這一點，但是後來開了倒車，已經當不起這疑古精神的優良傳統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者不反對打倒古代傳說中的偶像，這從郭沫若先生，楊榮國先生以及其他許多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來。我也覺得需要說明這個問題的實質，科學地證明這件事的積極意義，從而揮發這方面未曾發揮的新東西，使我自己的工作目標更為明確，意義更為重大。自然，要得到這樣的結果，無疑的是要把疑古精神與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學理結合起來，使中國古史學能夠向前推進一步，走向更新的途徑，從而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更好地服務。

我是哲學系畢業的學生，因為後來培養了歷史考據學的興趣，便輕視思維方面的概念式遊戲，以為做考據工作比較實際，便選一些歷史考據學方面的小題目來研究，後來，越走越轉向鑽牛角尖。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階級立場，政治路線等等。歷史考據學應該是歷史學中一個部門，這一部門無疑的要為歷史學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所以一味的重視考據，而輕視思想方面的綜合與分析工作，是很不對頭的。我的比較重要的著作如“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書，受莫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影響很深，主要的方向是從民俗學上出發；想從民族問題作中心，來敘述並考定古代部族在中國北方的移殖情況，也不能說這部書目的在鑽牛角尖。我在該書開始的一章里說過這樣的話：

“以前的歷史家，他們所看見的是英雄，是特出的人物，而忽略了一般人的事。假定一位歷史家不明白人群的複雜關係，其實他所看見的英雄或特出人物，也不是這個英雄或特出人物的真相”。

要是就這樣說法向前推進一步，我的科學研究工作也不至於脫離政治，脫離群眾。

我也曾經說過：“把歷史中的各種制度

抬高到首要地位，把許多制度的連帶關係細加說明，以見其影響於一般人的生活如何之深切。”“以達到敘述全體人類的生活為目的，這是歷史編纂學發展到最高一階段了。”有人批判我以上的說法，說這是違反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我以為不然，因為我的本意只是說明新的歷史學應該脫離為個人事迹的羈絆和應該放開眼界為人民大眾寫歷史一點而說的，我並沒有把社會的生產方式放在次要地位。

我以前也曾經有過這樣一種看法：“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之下，會產生不同的婚姻制度”。例如：古代的“行國”里行“三恪”制，就是多胞族通婚制；在“邑國”里行“耦婚”制，也就是兩胞族通婚制。但是這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部族應該產生於那一樣的社会制度之下呢？這些地方，我在當時感到很難處理，就因為我在當時對於馬列主義沒有研究。又如在“矢彝”里，有“諸侯：侯，甸，男，”一句話，這三個等級，我以前還只知道是古代的“侯服制度”，只是封建諸侯的原始的三個等級而已。到了寫“西周的社會性質”一文時，稍為涉獵了一下馬列主義的書籍，才認識到這三個等級與當時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係有主要的聯繫，原是古代封建制度的等級基礎，是當時生產方式的一種表現。這樣解釋，不是向前推進一步嗎？

歷史學是討論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學問這一點，我以前也已經承認了的，但只認為是個人掌握了這些規律之後，可以得到“立身處世之道”，從個人出發而不是為改造社會，為人民大眾服務。

總而言之，我在教學上，在科學研究上，應該採用馬列主義的講法，而且要站穩立場，加以深邃而靈活的運用；不能象教條主義者一樣，生搬硬套，虛應故事，應該創造性地加以發揮，勇敢地提出新的問題來；切實加以分析批判。其前提在於改變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真正有所收穫。

談「事后諸葛亮」

杜守素

由来已久，諸葛亮在广大民众的眼睛里，簡直就是智慧的化身。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群众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智慧；因而也热烈地崇拜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三国演义”的作者掌握了这种心理，更把諸葛亮描写得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料事如神、算无遗策的超人，造成民众智慧崇拜的突出的对象。俗話說，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諸葛亮”；各个战綫

上都有一种小会，也叫做“諸葛亮会”：这又表示了群众相信自己的智慧，认为只要集思广益就能够解决问题。

“三国演义”里面对于諸葛亮的描写，虽然含有文学上的夸张，但不是毫无根据的。陈寿的“三国志”記述了有名的“隆中对”，說明諸葛亮未出茅廬，就善于观察形势，早料定三分割据的局面，后来事实，大体如他所料。刘备败走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孙將軍（权）。”因向孙权分析形势，开陈利害，并激以正义，促成孙吳合作抗曹，终于取得赤壁之役的大胜利。后主建兴三年，亮率众南征，及秋，南中悉平。中間有“七纵七擒（孟获）”的故事。胜利后毅然录用其渠率（帅），不另置官吏，說是要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綱紀粗定，夷汉粗安。”这些都是諸葛亮之所以

为諸葛亮。

但是，另有一种情况。当人們对于那些把事情做坏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人提出指責或批評的时候，往往从当事人或旁观者那里听到“事后諸葛亮，誰不会？”的嘲諷。仿佛“事后諸葛亮”是一錢不值的。当然，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冒牌的諸葛亮，不管其为“事前”“事后”，我們都不需要。但倘若是善意的帮助总结經驗教訓，以便及时改正錯誤的所謂“事后諸葛亮”，那是不但不应当受到嘲諷，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

第一，要知道历史上的“諸葛亮”，一面是广有智慧，另一面也以謹慎著称。他自己就很自信地說过，“先帝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见出师表）。”而后人也給以“諸葛一生惟謹慎”的評語。謹慎，才能够“临事而惧，好謀而成”，才能够全面考虑問題于事前，虚心接受教訓于事后。三国志說，“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駐之基。耕者杂于涪滨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无私焉。”由此可见，屯田之計，是接受了屢次失败的教訓（包括木牛流馬沒有解决运粮問題）而定下来的。这說明就在“多謀善断”的諸葛亮；也还有不只一次地表现为事后諸葛亮的时候。其实，现身为事后諸葛亮，并不足以証明事前諸葛亮的不智，而由于总结工作、接受教訓，反足以扩充其事前諸葛亮的智慧。总而言之，事后諸葛亮与事前諸葛亮是辯証的統一的。

韓非說，“世异則事异”，“事异則备异”，“是以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治世之事，因为之备”。（均见五蠹篇）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而陈寿則称为“管（仲）萧（何）之亚匹”，他治蜀，一

反刘璋之废弛而尚严明，看来当属法家，或者也有取于韩非吧。

第二，由于时移、势易，条件必然发生变化，从发展的观点来说，事后诸葛亮很是重要。如果不随时检查和总结工作，我们的工作方法就不能够跟上去适应那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有一段话说得真好，又扼要，又具体，现在引在下面：

“……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实现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不合于实际，部分地错误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达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二—二八三页）

本来，客观世界（包含社会）的辩证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而我们反映客观世界发展及其规律的主观认识运动也就不能有止境。所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四页）可是，我们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却可以、也必须按照客观现实的性质和主观的要求，合理地把它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把某一发展阶段区分为若干小的客观过程。一个阶段或一个小过程开始之前，就是“事前”；一个阶段或一个小过程结束之后，就是“事后”。尽管“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但我们可以努力准确地或者接近准确地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期做到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就得靠事前审慎周详地“造成相应于该实践过程的法则性的思

想、理论、计划、方案”，这谓之事前诸葛亮。但是，既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那么，事后就必须周密细致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看看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从而得出工作的经验或教训，并以此指导再实践，这样循环往复，工作向前发展了，我们的能力也随之提高。这样看来，对于实践，事后诸葛亮并不比事前诸葛亮较不重要些。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就很着重这一点。

第三，对于实践的检查 and 总结，即事后诸葛亮，从认识理论说来，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必然的要求，构成其必不可少的一环，也就是说，它是有着认识论的根据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概括成为这样的一个公式：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五页）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自实践”，同时“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以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实践论”）因此，根据实践而发现的真理所造成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就必须付诸实施——再实践，看看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期获得“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认识——再认识。如果付诸实施之后，不去检查，不去总结，试问怎样能够知道该实践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什么而失败？不这样做，“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的再认识就会落空；一切科学文化的发展都会受到阻碍。由此可见，某些轻视工作的检查和总结、或把它看成额外负担的思想懒汉是错误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著名的公式本身，也正体现了“事前诸葛亮”与“事后诸葛亮”的统一。

路 綫 · 方 法 · 干 勁

賀 青

目前，許多人在大談工作方法，这是极为必要的。可是，有人从消极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担心这样一来会影响人们的干劲，或使人认为只要工作方法对头就可不需要有干劲了。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不論什么时候，都是需要正确路綫和干劲的。但是，有正确路綫和冲天干劲，还要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証方針政策路綫的順利执行和使冲天干劲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当然，大談工作方法，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不要干劲，而是要使得冲天干劲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真正能够把各項工作做得多快好省，这种冲天干劲和工作方法相統一的观点，才是符合辯証唯物主义，符合世界观和方法論相統一的原則的。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提出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劲冲天，建設事业一日千里，党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由于經驗和水平的限制，有些同志在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时，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不能自觉地注意工作方法，沒有很好执行或者根本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綫，因而也就违反了客观规律，使工作不能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效果。我們知道，人們的主观認識必須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必須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于客观规律的認識的基础上。显然，这不是只靠一股热情，而不理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只靠干劲，而不采取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所能做到的。

冲天干劲指的是人們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是人們革命积极性的高度發揮和对战胜困难的高度自信。这当然是革命

事业要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証。但是，有了冲天干劲，不一定就有好的工作方法，具有冲天干劲的人，理应更注意工作方法，因为这种人的特点就是要干，要革命，他們时刻都会碰到究竟应当如何干、如何革命的問題。工作方法，不是别的，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如果說这种工作方法对于干劲会有什么“影响”的話，那就是可以提高我們的工作水平，使高度的革命热情能够找到正当的出路，使一个人的干劲既可冲天，而双脚又能站稳在坚实的土地之上；犹如帮助急于过河的人架了一道桥或找到了一只船，除了使他肯定地迅速地到达彼岸以外，一点坏处也沒有。担心談工作方法会影响积极性的人，显然沒有考虑到，如果做工作不講究方法，乱搞一气，或者只凭“想当然”的办法盲目地干，以致违反客观规律，虽然你自己老觉得好心好意，竭尽全力为群众做好事，但是工作的客观效果却不好，群众当然也不会滿意，这时客观事实就会来教訓你，使你吃苦头，这就是所謂“物质的批判”。因此，講究工作方法，正是从积极方面来爱护和保护干部的干劲和积极性。

有人說：群众觉悟水平参差不齐，想法各种各样，事事要同群众商量，討論来討論去，麻煩得很，干劲也会給消磨光了。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沒有广大群众自觉的参加，不依靠群众大多数，任由少数干部去做，是很难达到預期的效果的。只有群众路綫才是多快好省的路綫。共产党人的冲天干劲，除了首先表现为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及时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和任务以外，还要善于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善于把党所提出

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科学共产主义所以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不但認識到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空想；而且找到了新社会的創造者——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能够发动广大群众自觉地参加斗争。怕麻烦，认为可以不同群众商量，只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的观点，实际上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这正是产生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领导的艺术就是要将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二者结合起来。每当进行工作的时候，应当把问题放到群众当中去，让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地申述自己的看法，经过深入的讨论，将其中正确和合理的部分集中起来，作出决

定，并采取说服的办法，使大家认识其中的错误意见为什么不对。只有这样，我们的决定才能正确，群众的积极性才能高度地发挥，从而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也才能经常保持。

还有人担心：谈工作方法，事事走群众路线，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不会的。强调走群众路线，绝不是放弃领导。相反，正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领导。因为这样一来，就不能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号召，和单凭少数人的意见决定问题，而必须深入群众，与群众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真正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得多快好省，这样，党和群众的联系也就一定更为密切，其实正是加强了党的领导。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会也不应当损害我们的革命干劲，而只会使二者相得益彰。它可以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滋长，避免走弯路，并且为我们的冲天干劲铺平一条通往胜利的康庄大道。

广东历史学会座谈我国农民战争发展规律问题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关于曹操评价问题，广东历史学会于六月廿八日继续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与评价曹操有密切关系的关于我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特别是黄巾起义的历史作用的估计问题。参加讨论会的有各高、中等学校历史教师、各有关研究机构历史工作者等六十余人。

在讨论会上，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关履权认为：黄巾起义是属于早期的农民战争。这个时期农民战争的主要要求是反饥饿，反劳役和争生存的斗争。因此，对于黄巾起义应作如下估计：一、瓦解了东汉政权，基本解除了东汉末年黑暗腐化统治局面，为后来较开明的政治局势扫清道路；二、打乱了当时土地所有制关系，为重新调整土地关系，缓和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与农民破产之间的矛盾；三、打击了豪强大族；四、推动了封建社会由早期发展到成长期。

华南师院史政系唐陶华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中国农民战争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应分为前后二期，而以隋朝为分界线。（唐陶华同志的发言已写成论文在本刊本期上发表）

（卢权）



“两种价值轉移”的論点是錯誤的

徐鉄騮

理論与实践編輯部同志：貴刊1959年第三期所載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的討論，梁克同志的发言談到了关于价值形成的問題，我認为頗值得商榷。发言者說：“生产資料的生产过程既是原材料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力的消耗过程，而原材料又是通过交换得来的，有着一定的价值量，抵偿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消耗所必需的消费品——商品，也具有价值量。所以，在进行生产資料的生产过程中，也就是两种价值的轉移，故在生产資料还没有进行交换以前，它基本上已具有社会必需劳动量所决定的价值量的商品性质，所以說，生产資料之所以具有商品的特性，是由于客观的存在，即交换必需按社会必需劳动量来决定的，并非由人們主观意志所决定，只是为了經濟核算的需要，計价等等。”（第17頁）关于生产資料是否商品的問題，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不过，如果說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也就是两种价值的轉移”，那我以为这是和馬克思經濟学說不相符的。

物質資料的生产过程（商品生产过程也在內），一方面要有人的劳动，另一方面，要有生产資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資料），有了这两方面的結合，才能够进行生产。现在我們是要考察商品价值的形成，所以就應該集中注意，把生产过程当作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这样我們就要計算生产物的价值形成。先考察生产資料这一方面。生产資料本

身也是劳动产品，生产它們也要花費一定的人类劳动，如果它們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全部被消費掉，其原来的使用价值现在已被完全改变为新的使用价值，那么，为生产它們所必要的全部劳动時間，会成为生产物（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如果生产資料只被消費一部分，則其价值就有相应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轉移于新生产物（商品）中。这就是生产資料价值的轉移問題。现在再考察实现商品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这一方面。既然我們要把生产过程当作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那么就不能从具体劳动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因为作为具体劳动是各不相同的，它只能創造使用价值。我們只能把它看作抽象劳动，那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在生产过程中，原料被看作生产者劳动的吸收器。这样，生产物（商品）的价值便最終地形成了，它包含有生产資料轉移来的价值，即所謂死劳动，同时又包含有生产者的活劳动，即新創造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只包含这两部分。不錯，生产者是要消費的，他吃掉的消费品如果是商品，也有价值，但这种价值决不会轉移到新生产物中而成为新生产物（商品）价值的一个組成部分。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那么，便会否定作为馬克思經濟学說的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論。資本家为要实现商品生产，除拥有生产資料外，还要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領取工資，这工資便是劳动力的价值，那正好是維

持工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需要的消費品的價值總和。但勞動力這一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特殊的性質，與其他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價值在被消費的時候，就是現實的生產勞動，那不但會創造出價值，而且還會創造出比勞動力本身的價值更大的價值來，這個差額就是剩餘價值的來源。馬克思正是在這點上建立起了他那不朽的經濟理論體系。如果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資料轉移來的價值和工人所消費的消費品轉移來的價值所組成的，那麼，工人領取工資和補償那些已被消費了的生產資料，就已把商品的價值瓜分完了，資本家又從什麼地方獲得剩餘價值呢？難道是從流通領域中去找尋這個利潤的源泉嗎？馬克思說：“勞動力的價值和它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放在自己心目中的，就是這個差額”。（資本論卷一第213頁）以上是就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論的。現在還要看看就社會主義下的商品生產來說又會怎樣。在社會主義下，商品生產過程同樣是生產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商品價值的一部分依然是由生產資料轉移來的，但勞動力不再是商品了，可是工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依然會創造新價值加入商品中去，成為商品價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認為這部分價值只是工人所消費的消費品的價值底轉移，就是說只等於工資，那麼，工人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即我們一般稱之為企業純收入或積累的部分，便會沒有了，這顯然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

由以上論述，可見那種認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也就是兩種價值的轉移”的論點是錯誤的，它違背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並會導致否定剩餘價值學說的結論，因此，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理論錯誤，是必須弄清楚的。

編輯同志：

商品的價值，的確是由在生產商品過程中所消耗的生資料的價值和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構成的。抵償勞動消耗所必需的消費品——商品，雖然有價值，但它的價值“決不會轉移到新生產物中而形成新生產物（商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徐鐵驊同志指出這一點，以糾正我在關於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座談會上發言的錯誤論點是十分必要的。

我的發言，本來只是為了討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資料是否商品這一問題，試圖從構成這些生資料的內在因素來談這些生資料的商品性質。其時並未考慮到這問題會涉及到價值形成的問題。但“兩種價值的轉移”這種說法，事實上接觸了商品價值形成的問題。錯誤論點之所以發生，是由於對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學說還沒有深刻的理解。原材料的價值之所以能向新的產品轉移，並構成為新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是由於原材料被繼續投入生產而成為生產消耗。其結果，它原有的使用價值轉化為生產物的新的使用價值，而它的價值也伴隨著向新的產品轉移。馬克思說：“但在考察價值形成時，我們看見了，一個使用

價值，為要生產一個新使用價值，而合目的地被消費時，生產那被消耗掉的使用價值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將成為生產新使用價值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這種勞動時間，會由被消耗的生資料，轉移到新生產物上面來，總之，勞動者保存了被消耗的生資料的價值，或把它當作價值構成部分，轉移到生產物上面來，但這不是由於一般勞動的加入，而是由於這個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的性質，由於它的特殊的生產形態。”（資本論卷一第221頁）也就是說具體勞動把生資料的價值保存並轉移到新生產物上去了。而抵償勞動所消耗的生活資料，它對於勞動者只具有使用價值，並不具有價值。它的消費，只是勞動者個人的消費。儘管在買主

手中的生活資料，還有價值存在的可能性，但勞動者購買它，並非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消費。因此，生活資料價值存在的可能性就不會成為現實性。只有把它繼續作為商品流通或繼續投入生產的情況下，它的價值存在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變為現實性。但當它被消費了的時候，它的使用價值轉化為新的勞動能力，這種新的勞動能力在被消費時，就是現實的生產勞動，那當作一般的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會形成新的價值追加到新的生產物中。消費品的價值就隨着它的使用價值的被消費而喪失，不會轉移于新生產物中。可見，認為抵償勞動消耗所必需的消費品的價值，可以向新產品轉移的論點，是不符合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這種錯誤是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的根本性的理論錯誤。

因此，有修改我在座談會上發言的必要。應改為：“生產資料的生產過程既是原

材料的消耗過程也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而原材料又是通過交換得來的，有着一定的價值量，在進行生產資料的生產過程中，也就是原材料價值轉移的過程，它的價值構成為新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抵償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消耗所必需的消費品既然是商品，而生產資料歸根結底‘是為了用來生產消費品而創造的，它的價值必然轉化為它們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值。消費品的價值則影響到生產資料製造部門中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水平，並影響這些部門所創造的產品的價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第509頁）這些都是使生產資料成為商品的內在因素。所以說，生產資料之所以具有商品的特性，是由於客觀的存在，即交換必需按社會必需勞動量來決定，並非由人們主觀意志決定，只是為了經濟核算和計價等等的需要。”

（梁克）

東南亞經濟資料匯編(季刊)

1959年第3期要目(7月1日出版)

1958年亞洲與遠東國家對外貿易情況……聯合國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凌壽全
泰國華僑經濟概況(1948—1956)……【美】G.W. 斯金納
泰國的對外貿易……【泰】1957年泰國經濟年鑑
東西方國家對印度尼西亞的援助……【英】D. 烏爾福斯頓

印度經濟問題專輯

喀拉拉邦政府的成就……【印】南布迪里巴德
共產黨領導下的喀拉拉邦政府兩年來感動人心的紀錄……【印】拉姆達斯
印度農業簡訊……【蘇】B. 楚維可夫
印度經濟危機及其結構……【日】尾崎彥朝
印度有組織的小型工業……【印】東方經濟學家
印度經濟資料統計……本刊編輯室

編輯出版者：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廣州越秀北路222號)

訂購處：全國各地郵局

零售處：廣州市永漢北路126號郵局期刊門市部

訂購辦法：本刊為內部參考資料，須憑有關單位介紹信訂購。第一、第二已經出版，如補購不便，可來信委託本編輯室代辦。

理論與實踐

月 刊

1959年第7期(總第19期)

編輯者：理論與實踐編委會
廣州越秀北路中國科學院
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出版者：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大南路43號

1959年7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廣東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廣東省廣州市郵局

預訂處：全國各地郵電局、所